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Tunghai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臺灣民眾的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

Meritocracy,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n Taiwan

鄭伊修

Cheng, Yi-Xiu

指導教授：劉正博士

Advisor: Liu, Jeng, Ph.D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July, 2018

碩士論文題目

臺灣民眾的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

研究生：鄭伊修

論文考試委員：

陳建州

陳 建 州

王維邦

王 維 邦

劉 正

劉 正

(論文指導教授)

系主任：

鄭志誠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2 日

摘要

近年來臺灣貧富差距的擴大與各類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層出不窮，導致臺灣民眾的意識形態認同產生變化。過去學者曾嘗試找出其中的緣由，發現功績主義的弱化、相對剝奪感的增強以及主觀社會地位認知的變化正代表著此一趨勢的具體展現。為了釐清此趨勢真正的樣貌，本研究將使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2015 年七期一次綜合組問卷之資料，探討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以及主觀社會地位三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以期能找出臺灣民眾在面對不平等的社會環境時，內在感受與自我認同變化之間存在的關聯性。

而本研究發現臺灣民眾的功績主義認同確實正逐漸弱化，同時相對剝奪感也持續提高，這些現象背後的成因顯然與臺灣的社會不平等結構逐漸深化有強烈的因果關係。在三者的關係上，在控制客觀階級、社交網路規模以及個人背景因素的影響後，功績主義的認同能有效減緩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則會顯著降低個人的主觀社會地位認知，但對於非技術工人而言此效果是較小的；最後，功績主義的認同將有助於提高主觀社會地位的認知。總之，臺灣民眾確實因為日漸深刻的社會不平等而感到失望，這些感受與認同不僅受到客觀環境影響，亦是受到自身內在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左右。

關鍵字：相對剝奪感、主觀社會地位、功績主義、客觀階級、社交網絡

Abstract

Fo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social inequality in Taiwan has become been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Scholars claimed that the weakening belief in meritocracy, exacerbating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hanging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re associated with Taiwan's social inequality. Using data from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we employ ANOVA and OLS to investigate Taiwan's social inequality and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these key variables.

According to our data analys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belief in meritocracy is diminishing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is worsening gradually and we believe that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Taiwan. Further, after controlling the objective class, social network, and other personal background factors, belief in meritocracy will mitigate relative depriva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will reduce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but this effect is not too significant for unskilled laborers; and belief in meritocracy will promote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n sum, we argue that people feel upset for the worsening social inequality, not only affected by external objective factors, but also influenced by internal value judgments and ideologies.

Key words: relative deprivation,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belief in meritocracy, objective class, social network

謝誌

身為一個稱職的東海人，從大學入學至今在東海就讀已有六年餘，若問我在東海學到了些什麼？我可能一時之間還無法回答。並不是因為我什麼都沒學到，而是我學到太多太多東西了，使我一言難盡。

如果真的要我說些學到了什麼，大概能整理出以下幾類吧：

第一類是知識上的學習。在就讀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社會學是什麼樣的知識，甚至不知道自己該如何面對自己所學的理論與知識。然而，經過了近六年的學習和薰陶後，雖不敢斷言自己多麼了解社會學，但至少我能明白自己透過社會學所提供的知識框架可以做到哪些事情，以及能判斷哪些事是合理的，我想作為一位尚未步入社會的新鮮人而言，這應該是足以驕傲的了。

第二類是待人處世上的學習。過去我害怕接觸他人，我心裡也明白原因不僅是出自於對他人的警戒，亦是害怕被他人討厭而無所作為。但經過這六年來的各種際遇後，我發現即使害怕仍必須踏出第一步，因為我體會到了「沒有人可以讓所有人都喜歡」這一道理，即使犯錯而受到他人誤會或指責，也必須勇於面對且積極修正，才能讓人信服。

第三類則是心態上的學習。過去我時常逃避自己所不願意面對的事物，也因此讓我有時總是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氛圍。然而在擔任課程助教的這三年裡，我逐漸明白這種心態無法獲得他人的信任，甚至沒有能面對任何人的自信。因此在教導學生的過程中，我慢慢地調整我的心態，也讓我逐漸明白自己應該做的事不能省心，至少要求自己「不用做到完美，但至少盡力做到最好」。即使費力耗時，但至少能感覺到自己的成長與成就感。

最後一類則是生活經驗上的學習。相比大學以前的生活，這六年來離鄉背井的經驗讓我成長許多，尤其是獨自生活的經驗讓我能夠經歷到過去未能體驗的事物，即使是簡單的洗衣折衣、清理房間，甚至適應都市生活的各種細節，這些事

情聽起來總是簡單的，但沒有自己親自經歷時卻又不是那麼的踏實。如今，至少我認為這些身處異鄉的日常生活經驗能夠幫助我在未來更快適應各種環境的變化。

當然，在這六年來的學習歷程中還受到許多人的幫助與和教導，才会有這本碩士論文的誕生，也才能為我這長達六年的學生生涯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在下面各段我要好好的謝謝這些在我生命中的貴人。

首先要感謝的就是實質上幫助我最多的指導老師，劉正教授。雖然我和劉老師一開始只是因為「教育社會學」這門選修課而認識，日後也僅有在每週的選修課堂上見面，但當我決定要報考研究所時，他就直接答應能夠指導我的碩士論文，讓我不勝感激。而在成為劉老師的指導碩士生後，發現劉老師在許多事上追求完美，讓我不論是在寫論文還是在幫忙處理課程的事務上都小心翼翼、畢恭畢敬，深怕有任何做錯的地方。但也因此有機會磨練自己的抗壓性與專注力，並且提升自我的標準，以能夠朝向更高的目標努力與邁進。也感謝劉老師在這兩年指導的期間不厭其煩地檢閱我的論文初稿，並給了我許多實質上的意見，讓我在每一次討論後都受益良多，並有了新的目標可以繼續前進。

同時，也要感謝兩位口試委員老師給我的論文諸多建議，讓我有機會能完成這篇論文。先要感謝王維邦老師不僅在口試時提供了許多論文的修改建議，還在口試前持續不斷地關注我的論文進度，更在每次上課和會面時嘗試對我的思考邏輯或論文提出更進一步的挑戰，讓我有機會能針對這些弱點來反覆思考如何精進我的論文內容與架構；也要感謝陳建州老師為了口試遠從高雄而來，給予我在統計技術上的指正並當面肯定我的文筆與文章，讓我對於這篇論文的完成感到更有自信。

再來要感謝在六年來教導過我的各位老師以及助教們。感謝陳正慧老師在統計學上的鑽牛角尖，沒有當初的操練我也沒有今天量化統計的基礎；感謝鄭志成老師在思想史上的用心教導，使我能夠精進除了實務操作以外的思考邏輯；感謝

許甘霖老師在社會學理論上的教誨，讓我在學習理論時總是時時警惕是否理解錯誤；感謝趙剛老師在社會學課堂上的啟蒙，讓我在初次接觸社會學的時候有明確的學習目標；感謝巫麗雪老師的熱心接納，讓我在有疑惑或心情低落時能夠為我解惑；也感謝常斌、鍬鈴和妙姿姐的各種幫忙，總是在我處理各種書面事務而不知所措的時候提供適當的建議和幫忙。

也感謝六年來陪我屁話聊天、切磋學問的學長姐與同學們。感謝楊儒晟、葉守禮、陳展宇、鄭蘭等學長姐們在我有疑惑的時候能夠慷慨解囊相授；感謝官佑昌、劉大維、陳哲森等同學們在我徬徨失落的時候陪我聊天，以及分享各自的心得與知識。也得謝謝讓我和所有人相遇的東海，如果不是在東海就讀，可能我的人生就會完全不一樣，祝東海在未來能夠在各方面都有更好的表現。

最後，當然還要深深地感謝我的家人，沒有他們的支持我無法讀完這六年的書。雖然父母總是口口聲聲說讀書最重要，但每當我看到因為鮮少的長假而返家時他們的臉上開心的表情，以及在我走進車站要離開臺東時他們微微失落的神情，總是讓我有點不捨，同時也讓我有種任重道遠的責任感；不僅如此，那些在家和父母悠閒度日的期間，儘管只是坐在沙發上一起聊天、看電視，或是幫忙做點家事，都讓長期在外的我體會到何謂「回到家」的感受，也才有機會讓疲憊的身心有種「充電」的踏實感。如果沒有父母這樣子的默默支持，我想我是撐不下去的。

因此，這篇論文並不只要獻給那些有興趣翻閱它的讀者們，亦是我給這些為我打氣、默默支持我的人一個交代，並希望這篇論文能夠為這個世界帶來一點點小小的貢獻與改變。

目錄

| | |
|------------------------------------|-----------|
| 摘要..... | I |
| Abstract..... | II |
| 謝誌..... | III |
| 目錄..... | VII |
| 圖表目錄..... | IX |
| 第一章 緒言 | 1 |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4 |
| 第一節 相對剝奪感和功績主義之間的關聯性 | 4 |
| 一、相對剝奪感的定義與意涵..... | 4 |
| 二、功績主義的意義與範疇..... | 7 |
| 三、功績主義認同與相對剝奪感的關聯性..... | 8 |
| 四、小結..... | 9 |
| 第二節 相對剝奪感和主觀階級認知之間的關聯 | 10 |
| 一、主觀階級的背景研究..... | 10 |
| 二、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聯..... | 12 |
| 第三節 唯物論與參考團體理論脈絡及其影響 | 12 |
| 第四節 功績主義和主觀社會地位的關聯 | 15 |
| 第五節 本研究欲驗證之假設 | 15 |
| 一、功績主義假說..... | 16 |
| 二、相對剝奪感假說..... | 17 |
| 三、小結..... | 18 |
| 第三章 研究設計 | 20 |
| 第一節 資料庫簡介與研究母體 | 20 |
| 第二節 分析方法 | 20 |

| | |
|-----------------------------|----|
| 第三節 變數建構 | 21 |
| 一、依變數..... | 21 |
| 二、自變數..... | 22 |
| 三、控制變數..... | 24 |
| 第四節 變數檢視 | 24 |
| 第四章 分析結果 | 27 |
| 第一節 功績主義的弱化與差異 | 27 |
| 一、臺灣社會整體的功績主義認同轉變..... | 27 |
| 二、功績主義認同的差異..... | 28 |
| 第二節 相對剝奪感的增長與差異 | 29 |
| 一、臺灣社會整體的相對剝奪感演變趨勢..... | 29 |
| 二、相對剝奪感的差異..... | 31 |
| 第三節 主觀社會地位認知的變化與差異 | 32 |
| 一、臺灣社會整體的主觀社會地位認知變化..... | 32 |
| 二、主觀社會地位認知的差異..... | 33 |
| 第四節 功績主義假說與相對剝奪感假說的驗證 | 34 |
| 一、功績主義假說的檢驗..... | 35 |
| 二、相對剝奪感假說的檢驗..... | 37 |
| 第五節 小結 | 40 |
|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 43 |
| 參考文獻..... | 46 |

圖表目錄

| | |
|--|----|
| 表 1 本研究變數之描述性統計 | 25 |
| 表 2 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於各階級之間的差異 (N=1899) | 29 |
| 表 3 相對剝奪感影響因素之 OLS 迴歸分析 (N=1899) | 36 |
| 表 4 主觀社會地位影響因素之 OLS 迴歸分析 (N=1899) | 38 |
| | |
| 圖 1 本研究企圖驗證之研究架構 | 19 |
| 圖 2 臺灣民眾對「一個人只要肯吃苦，就一定會成功」贊成與否，1985-2015 年 | 28 |
| 圖 3 臺灣民眾對「現在社會變得有錢人愈來愈有錢，像我這樣的人再怎麼努力 也趕不上」的說法贊成與否，1995-2015 年 | 30 |
| 圖 4 臺灣每人所得（每戶所得 / 戶量）之吉尼係數折線圖，1995-2015 年 | 31 |
| 圖 5 臺灣民眾歷年主觀社會地位的平均數，1992-2015 年 | 33 |

第一章 緒言

近年來，臺灣社會的不平等與貧富差距擴大一直都是值得關注的議題。儘管臺灣貧富差距在世界上並非名列前茅，但隨著吉尼係數的逐年增長、媒體報導的渲染，甚至近幾年來，經濟結構轉變與景氣衰弱所帶來的薪資低落，以致於生活水準的差距，逐漸顯著到連社會大眾都能明顯感受到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因此讓社會不平等逐漸成為臺灣民眾所關注的一個社會癥結。

以過去的研究來說，臺灣社會的不平等確實是一直存在，且歷經過許多轉折點。從國民黨政府遷臺時期政治菁英與鄉土仕紳衝突、土地改革下從大地主解放出來的佃農與新興小地主出現、甚至是十大建設時期前後工業興起並催生出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每一時期社會結構轉變的同時也讓臺灣整體的經濟環境產生劇烈變化，一併改變了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模式（蘇國賢 2008）；林宗弘（2009）也發現臺灣近幾年來，社會階層化與不平等的趨勢逐漸朝向後工業社會模式邁進，服務業興起讓個人技術逐漸嶄露頭角，但這一切的轉變仍然無法擺脫資本繼承造成社會貧富不均的陰影。總而言之，階級結構的移轉雖緩慢且難以動搖，但仍可見每個時期都有著不同類型的階級分佈，而這些社會結構的轉變並非個人所能決定的。而社會結構變化所帶來的階級差異與社會不平等所帶來的問題，也已有許多臺灣社會科學的學者們持續關注並討論，如臺灣高等教育中特殊階級與社會菁英的集中與壟斷（駱明慶 2002；謝雨生、黃美玲 2012），或是各地下層階級的分佈成因與所得分配不均（蔡明璋 1996；蘇國賢 2008）等問題。

不僅是學者指出臺灣社會中日漸深化的不平等，民眾本身更是因為物價的上漲、產業的外移、薪資的凍漲，甚至是一例一休等種種的社會現象所造成的生活變化，導致民眾的心理感受與觀念上產生差異與改變。有些學者發現了這樣的趨勢並嘗試解釋其內容與原因，有的學者認為此感受是一種無法適應社會快速變化所造成的集體性落差，即是因臺灣近二、三十年來快速地社會變遷，讓社會中各種價值觀有著大小不一的變化，諸如社會倫理價值觀趨於平等和外部化、經濟成

就價值觀趨於功利主義等，形成了部分進取卻又部分保守的矛盾氛圍，因其變化之顯著但又是潛移默化的，而被稱為是「寧靜革命」，同時也意味著臺灣民眾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顯得無所適從（關秉寅、王永慈 2005）；有的學者認為此感受是臺灣社會整體的就職環境變化所導致的工作價值觀改變，也就是儘管臺灣民眾對於「吃苦就一定能成功」的認同雖不如媒體所強調的那般低落與失望，但也因為經濟環境不安定，而使多數人開始偏向只求溫飽與穩定工作等較為保守的意識形態（蔡明璋 2012）；另外，也有學者認為此感受是一種因臺灣經濟結構變遷所導致的意識形態改變，其發現臺灣民眾面對臺灣轉型成後工業化社會後，各種結構性的衝擊與隨之而來的經濟衰弱，使社會整體對於功績主義的認同與非技術工人等較弱勢者的主觀社會地位都隨著時間演進而降低，同時相對剝奪感也逐漸增強，其將這種變化稱為臺灣的「失落年代」（林宗弘 2013）。

本研究認為臺灣社會的不安情緒就如同上文各個學者所發現到的，很可能與社會不平等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有關，且這些負面影響各有不同的層面。其中一方面因薪資的凍漲與物價的上升，導致個人努力的付出不再像過去的臺灣一樣能夠讓人有滿意和相等的報酬，因此同意「吃苦就一定能成功」這類功績主義論述的人也就漸漸減少（蔡明璋 2012），顯示判斷報酬是否合理與公平的價值觀正遭受到質疑；另一方面因收入不均與奢侈品的普及已成為可見且無法被改變的事實，使得臺灣民眾普遍的相對剝奪感增強（林宗弘 2013）；最後，相對剝奪感所造成的無力感又再回饋到自我的身份認同上，使人貶低自己的社會地位。

上述的這一邏輯性的推論顯示這些現象之間很可能是有所關聯，甚至是環環相扣的。儘管各種感受與認同都是源自於社會不平等的客觀現實，但仍可以試想的是：個人若不再相信這個社會存在「個人只要努力就會成功」此一功績主義的信念時，便會對現實生活的差異感到不滿；而這個不滿便是因為再怎麼努力都還是無法追趕上有錢有勢的人，也就是努力而徒勞無功的相對剝奪感將會油然而生；最後，相對剝奪感將再進一步影響自我的身份認知，也就是使人產生自我懷疑甚至是自貶身份，其所呈現出的結果即是主觀社會地位的下降。更甚者，可以從另

外一方面來思考的是，人們對於「個人只要努力就會成功」的功績主義論述認同度越高時，其樂觀的態度也可能有助於主觀社會地位的提升。

然而，這些論述真的成立嗎？個人對於功績主義的認同是否真的影響其相對剝奪感受？個人的相對剝奪感受是否真的又會影響其主觀社會地位認知？如果上述兩個問題都成立的話，那又是什麼樣的因素可能影響上述兩者的關係呢？而個人的功績主義認同是否還會影響到主觀社會地位的高低？這些問題在過去似乎未被臺灣學者有系統的深入探討。為此，本研究將探討個人對於現實生活的感受，特別是在社會不平等日趨嚴重的狀況下，臺灣民眾對功績主義的失望所造成的相對剝奪感的增強之現象，以及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連結，還有功績主義的認同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聯性等三者之間的關係。希望透過回答這些問題，能看見臺灣民眾在社會不平等持續擴大的日常生活中，所呈現出的個人感受變化與其所導致的身份認知差異，並以此研究脈絡來窺探在客觀社會結構中所無法呈現的個人心理狀態之細微變化。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為能充分了解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聯性，將透過以下的內容順序整理過去的文獻內容並回顧其理論脈絡，以梳理出本研究得以補足之處。第一節將探討相對剝奪感與功績主義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首先，本研究先回顧過去研究對於相對剝奪感的定義、意涵，以理解這一概念在過去是如何被學者所認識與討論的，並說明本研究所關注的功績主義之定義與其所指為何。而後將闡述過去研究對於公平、合理等價值觀與相對剝奪感之間的相關論述，並嘗試將這層關係延伸至功績主義這一意識形態上，以找出功績主義和相對剝奪感之間關係的合理性。

第二節將簡要說明主觀階級的重要性與過去臺灣的背景研究，而後將討論相對剝奪感和主觀社會地位之間在過去研究中所表現出的關聯性為何，並為兩者在本研究之中的關係做說明；第三節將整理在階級認知與認同的討論中兩個常見論述：唯物論與參考團體理論的觀點，並將這兩者作為本研究的控制與交互作用變數，以觀察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三者之間的獨立關係是否存在，以及其之間的變化是否與這兩個理論有關；第四節將簡述功績主義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存在的，以及本研究如何討論兩者的關係；最後，第五節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假設，並將其整合後製成一組研究架構簡圖。

第一節 相對剝奪感和功績主義之間的關聯性

一、相對剝奪感的定義與意涵

相對剝奪 (Relative Deprivation) 一詞具有兩個涵義，第一是指客觀的物質不對稱所造成的相對剝奪，諸如工作價值與薪資之間的落差、與同僚或同業者等他人之間的待遇落差等。過去研究曾以此為主軸挑戰人力資本論的觀點，即若是提供高額的獎勵薪資就會增加工人的生產效率，其結果卻發現對於臺灣的製造業者而言，薪資的獎勵未必能有效增加生產效率，但若是薪資比該工作水平的平均

薪水少而構成相對剝奪的話，生產效率將有明顯的降低(Liu and Sakamoto 2005)；第二則是指個人在認知與心態上主觀的相對剝奪感受，此一感受雖仍會因為客觀處境的影響而形成相對剝奪感，但個人經驗與價值觀的不同更有可能是形成此感受的主要原因。過去研究就曾發現兩位不同薪資的工人之間，前者雖然薪資較高，但其認為自己的薪水應得更多而有較高的相對剝奪感，相反地，薪資較低的工人則自認為薪資足夠而表現出較為接受現況的心態(Crosby 1976)。本研究試圖探討的是臺灣民眾對於社會不平等所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受，所以後者將是本研究所著重討論的重點。

關於這類物質差異所造成的相對落差感受的描述，則可從馬克思對於勞動階級與資本家之間，收入的差異導致的生活水準落差比喻中看到。馬克思曾於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中以下列比喻表現出相對於工資而言，資本增長的不合理性所造成之物質生活差異：

一間房子可大可小，如果這間房子與周圍鄰居的房子都同樣狹小的話，是可以讓人接受這樣子的生活環境；但如果在這間房子旁邊蓋起了一座宮殿，那周圍其他小房子嚴然就變成了簡陋的小棚子。而現在這些小房子看起來就像是毫無社會地位的犯人。¹ (Marx 2010 [1847]: 23)

這一段話不僅諷刺了資本家與勞工之間收入不均與資本報酬率的過度膨脹所帶來的物質生活差異外，同時也隱含不平等所可能催生出的相對剝奪感受。不僅是絕對的物質收入或生活品質會影響人們對於自己生活過得好不好、正不正常的感受，同時人們也會藉由相互比較的方式來定義自己的物質生活是否舒適、恰當，就如同馬克思對於房子的比喻一樣，若是周遭都是大小一致的房子，即使自己住的地方小而簡陋也不是難以接受的事；但如果旁邊出現格格不入的宮殿時卻會顯得自己很寒酸，導致對於生活的不滿足油然而生。而這類不平等隨著社會上資本家越是富裕時對比就越加明顯，以致於社會整體都能感受到各種財富不均所

¹ 此段中文為筆者根據文獻出處自行翻譯而成

造成的生活水準差異，這種對比現象也將不再僅限於自己周遭，而是瀰漫在整個社會之中，也更加強化勞動階級對於自身處境的集體認同 (Marx 2010 [1847])。

而對於相對剝奪感一詞有實際討論的則是 Stouffer 於 *The American Soldier* 中，透過觀察美國軍中士兵士氣與認同的變化中所發現到的。Stouffer 觀察美國士兵在軍中的行為，發現士氣不僅是受官階、制度等結構性外在因素影響，還受到同袍之間的各種互動所影響，例如有已婚同袍者其自我犧牲的意願程度會較高，或是當其他較低學歷的人升遷較快時則會引起高學歷者更多的抱怨等，而 Merton 更是將這些經驗證據藉由社會學的觀點重新詮釋，並加入參考團體的論點來驗證這一經驗證據的存在和相對剝奪感形成的原因 (Merton and Lazarsfeld 1950)。

隨著時間的演進，相對剝奪感在定義上越加完備，其所對應的範圍亦日漸寬廣。相對剝奪感雖包含諸多層次與面向的可能性，但其定義最終仍涵蓋以下四個重點：(1) 某人沒有某物；(2) 某人過去有某物或看到其他人有某物；(3) 某人想要某物；(4) 某人認為他／她應該擁有某物 (Crosby 1976；Yitzhaki 1979)，其中又依對照對象的不同而使得相對剝奪感的來源有所差異時，又會分為兩種相對剝奪感，一為因對象是個人時所產生的個人相對剝奪感 (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二為因對象是團體時所產生的團體相對剝奪感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Runciman 1993)。日後也有諸多研究採取此種分類，甚至衍伸出相對應的模型以討論個人和團體的相對剝奪感之間是如何相關，以及它們各自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下影響個人行動與認知 (Crosby 1976；Sablonnière and Tougas 2008；Smith, Pettigrew, Poppin and Bialosiewicz 2012；Smith and Huo 2014)。

其中，多數對於相對剝奪感的討論都和個人境遇、行為以及身心健康有所關聯，且大多將相對剝奪感視為中介變數或是交互變數。過去所建構的理論模型中通常會認為現實的際遇與行為會透過心靈感受而再次影響之後的個人行動模式 (Crosby 1976；Smith and Huo 2014)，抑或是討論在遭遇社會變化或困境下，個人的團體認同與短時間內所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將強化自身對於其所處團體價值觀的認同 (Sablonnière and Tougas 2008)，以及作為形塑個人偏見的中介變數等

(Pettigrew, Christ, Wagner, Meertens, Dick and Zick 2008)；部分研究則是將相對剝奪感視為心理或健康行為的負面因素之一，如經濟困境所造成的相對剝奪感與抽菸、酗酒等行為呈現正相關（林晏如 2015；林晏如 2016）。

另外，也有研究從社會性的因素著手討論相對剝奪感的產生與影響，這些討論相較於針對個人行為與心理層次的討論脈絡而言，較為考慮到宏觀結構對於相對剝奪感的影響，如有以中國國營事業員工為例，採用性別、收入、學歷與婚姻狀態等基本人口特質作為自變數，探討相對剝奪感的基本成因（杜慧、盧旖旎、李丁 2013）；或嘗試測量出相對剝奪感與基尼係數之間的關聯性，其結果顯示國家內部經濟的不平等若越是明顯，將導致民眾集體的相對剝奪感的增加（Yitzhaki 1979；Hey and Lambert 1980）。

總而言之，過去與相對剝奪感相關的研究仍大多停留在個人行為或是社會結構等實在的客觀因素上，並將相對剝奪感視為客觀環境下產生的副產物，而非將之視為真正的主角來詳細討論。因此，本研究將先以相對剝奪感作為主角，嘗試以較為另類的觀點考察上文研究中沒有提到的另一個重要的概念，也就是在緒言中提及的功績主義，與相對剝奪感的變化之間是否有所關聯。下文將闡述本研究所指稱的功績主義為何，以及其與相對剝奪感之間的關係可能存在的原因，並以現有的討論作為延伸此論述的基礎，希望能找出集體性的意識形態與個人感受的相對剝奪感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

二、功績主義的意義與範疇

功績主義（Meritocracy）廣義而言是期待社會將會給予和個人的功績、成就等能力指標相符報酬的一種意識形態。在功績主義的假設下，一個人的能力所能達成之成就與功績能得以回報相對應的經濟地位與物質報酬，因此差別待遇是合理的，因為報酬將隨著個人的貢獻與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相較於以往的舊工業社會中以資本和勞動力等非個人的物質因素所造成之生產力差異，現今世界各國正逐漸邁入後工業社會、知識社會等新興社會型態中，服務業、金融業、高科技產

業等注重專業與高知識技術的產業成為社會主要的生產力來源，讓強調知識、技術與創新等個人能力的功績主義逐漸成為社會中的主流意識形態（Bell 1995）。

而本研究要探討到的就是這一廣義概念下所衍伸出來的一種信念，即個人對於「個人只要憑藉自身的能力與努力就能成功」這一種對於個人得以獲得與功績相對應之報酬的信念（Belief in Meritocracy），過去國外研究將此信念比喻成一種「美國夢」（American Dream），充分表達了功績主義信念下，個人努力與相對應報酬之間應是合理的期待與想像（Csepeli, Antal, Mária and Ildikó 2004；McCoy, Joseph, Brandon, Laura and Elissa 2013）。

下文將繼續說明這種信念是如何與相對剝奪感之間產生關聯，並理解兩者之間關係的正負向關係，以期能夠建構出合理的研究脈絡，並為下文的分析與討論提供一個明確的說法。

三、功績主義認同與相對剝奪感的關聯性

如上文所述，過去的研究僅將相對剝奪感作為中介或交互變數，且預設相對剝奪感的存在與人們的物質處境息息相關，而這些處境所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將會再度影響個人的行動模式（Crosby 1976；Smith and Huo 2014）。正因為如此，相對剝奪感通常僅作為第三者而鮮少被作為一個主角來討論。為了彌補此一缺憾並試著提供另一種可能切入的研究角度，本研究將提出另一種看法，即是將個人的意識形態視為影響相對剝奪感感受的重要成因，這種意識形態特別指的是一種認同個人在自由競爭下，努力得以獲得相對應報酬或成功機會的功績主義信念，希望透過這種討論能夠探索個人的意識形態與相對剝奪感之間互動的可能性。

然而，要精確測量到功績主義的認同仍是相當困難，因為意識形態的存在與意涵是相當潛在且複雜的。在臺灣的研究中較多學者採用的是對「一個人只要肯吃苦，就一定會成功」這一論述的同意程度作為功績主義的測量（蔡明璋 2012；林宗弘 2013）。其緣由一方面是此論述接近於臺灣本土的諺語「愛拚才會贏」，有著深刻的文化意義所以較容易讓受訪者理解其背後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另一方

面也較為符合國外學者對於個人努力與正當回報的功績主義論述（Bell 1995；Csepeli et al. 2004；McCoy et al. 2013）。本研究也將採取此定義作為測量對功績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強弱，並檢驗其是否如同現實個人境遇一樣能對相對剝奪感的感受造成影響。

雖然在過去並沒有詳細探討功績主義與相對剝奪感之間是否有關的討論，但許多研究顯示相對剝奪感的存在與公平合理等價值判斷有十足的關聯性，而這種價值觀的存在與功績主義的意涵是相近的。相對剝奪感本身牽涉到的不僅是客觀境遇的經驗，更是關乎於個人如何評斷自身所得是否合理的認知，而這種判斷便是根基在個人對於公平正義和合理報酬的認知與價值觀的基礎上，甚至主觀的價值評斷對相對剝奪感的影響可能比現實收入與物質差異還來得更為重要（Runciman 1993；Crosby 1976；Ellemers and Bos 1998；Smith, Pettigrew, Poppin and Bialosiewicz 2012）。社會若是普遍認同「個人透過自由競爭與努力得以獲得回報」的此一功績主義存在時，身處於其中的個人很大程度上就會相信並接受這種評斷公平合理的價值觀（Bell 1995），換言之，個人認知與價值觀的背後存在的不僅是個人境遇，其源頭還是一種社會集體的共識所形成的意識形態，而公平正義與報酬合理與否的判斷基準顯然與相信個人能力與報酬相符的功績主義有所關聯。

四、小結

藉由本節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構成相對剝奪感的因素是相當複雜且多元的。起初學者們觀察到的是生活差異日漸擴大與報酬不均導致內心的不滿足，並將這種不滿足稱為相對剝奪感。日後衍生的研究更是發現相對剝奪感並不只源於客觀生活的差異，甚至自身判斷所得是否公平合理的價值觀和這種不滿足之間有著更大的關聯性。然而，過去的文獻大多對這種關聯性所提出假設與研究僅止於個人的經驗層次，因此本研究在透過簡短的說明後，指出功績主義此一意識形態與過去文獻所提之個人公平感受有可能同為公平與合理的評判標準，是故本研究將功

績主義作為主要變數，並認為此一變數將是影響相對剝奪感的其中一種可能，也就是以意識形態的角度觀察個人評判公平、合理的價值觀是否會影響相對剝奪感的高低。

上文的論述為本研究想要探討的第一部分，即確認相對剝奪感如何被過去學者們所認知，並整合其研究成果後導出一個可能的關係，即功績主義的認同將可能影響個人的相對剝奪感受。下文將整理出過去研究對於主觀階級的討論，並闡述相對剝奪感和其之間的關係。之後將簡述社會學界中兩個常見的觀點：唯物論與參考團體論，指出這兩者分別是如何認知到主觀階級與社會地位的建構過程，以瞭解這兩個論述在建構主觀社會地位過程中的重要性，並將其作為控制的背景因素和交互作用的因素，以突顯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與變化。

第二節 相對剝奪感和主觀階級認知之間的關聯

一、主觀階級的背景研究

主觀階級是在社會學的研究中時常被討論且銘記在心的重要概念。「階級」這一概念是社會學探討社會不平等時最核心的指標，其意味著人類社會自我分層的結果，其中包含了社會地位以及階級身份等區分，而這些區隔在馬克思的研究中，更是將階級在社會不平等中所扮演的角色闡述更為細緻與生動。後繼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不僅是客觀的階級差異造就了現實不平等的結果，個人對於自身主觀階級的認知與認同更是驅動人們適應社會甚至組織反抗的開端，因為若是彼此沒有基礎的身份認同，也就無法更進一步形成共同的階級團體（黃毅志 1999）。

過去已有許多臺灣社會學者指出臺灣社會不平等的各種因素可能影響了臺灣民眾的主觀階級認同與認知，這些因素包含許多背景因素，如教育、年齡與世代，甚至是國家的經濟能力等。教育方面，個人教育程度的高低會直接反應個人背後持有之經濟能力、階級與社會地位的高低，換言之，教育是一種階級複製的表象；而從結構面來說，雖然教育機會的擴張雖有助於緩解階級不平等所帶來的

差異，但實際上，在教育質和量皆有不平等的現象不斷被複製（Rftery and Hout 1993；Lucas 2001；駱明慶 2002；謝雨生、黃美玲 2012），雖然臺灣歷經高教擴張的衝擊後使得文憑貶值，導致教育程度對主觀社會地位的影響隨著時間而逐漸變小，但教育本身仍是不可忽視的變數（張峰彬、關秉寅 2012）；年齡與世代方面，過去研究顯示年齡越高者其主觀階級的認同是較低的，但其影響力並不顯著（黃毅志 1999），然而在後續討論主觀階級的相關研究則顯示不同的世代，不論是在客觀或主觀上的階級皆有顯著的差異（林宗弘 2009）；另外，國外學者也整理出包含臺灣在內四十四個國家的主觀社會地位資料並將之比對分析，發現各國國民的主觀社會地位在國家間的差異不僅來自於國家整體的經濟實力(GDP)，更是源自於國內社會不平等的顯著程度，也就是隨著國家的吉尼係數越高，其內部國民的平均主觀社會地位就越低（Anderson and Curtis 2012）。

除了上述的背景因素外，社會轉型所造成的階級結構轉變亦是影響臺灣民眾主觀階級認同變化的要因。近幾年來學者以馬克思主義的客觀社會階級分類來討論個人主觀階級的變化，發覺是否為無產階級已不再是臺灣民眾主觀階級有效的分界線，而是與臺灣社會的後工業化有關，即決定個人職業與收入的階級界線已經從生產工具的有無變成了技術、知識與專業性的高低之分（黃毅志 1999；林宗弘 2009）。換言之，主觀階級將不再是以單純的資本有無作區分，而是與實際的社會整體經濟狀態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在後工業化的社會中，職業本身所蘊含的專業性與權威構成了職業聲望，並成為一個人社經地位的表徵，且職業聲望間接反映了個人於整體社會之中的技術不可替代性和才能的展演（黃毅志 2003）。

然而，臺灣的研究並未對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的階級或社會地位之間的關聯性是否存在有過詳細的討論，僅有針對臺灣民眾近年來相對剝奪感的增強現象有過部分的說明（林宗弘 2013），因此本研究試圖將討論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並透過國外的研究找尋其之間關係存在的蛛絲馬跡，並為這層關係提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說法。

二、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聯

過去的研究雖未直接針對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有過詳細的討論，但也確實有指出過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Pettigrew 等人透過分析三份歐洲問卷的資料，試圖理解團體與個人的相對剝奪感是否對於不同群體間的偏見與歧視存在顯著的影響。在其路徑分析中不僅發現到團體的相對剝奪感對於偏見有著正向影響外，亦觀察到主觀社會地位的存在同時負向地影響了個人與團體相對剝奪感（Pettigrew et al. 2008）。

然而，主觀社會地位的存在確實有可能先於相對剝奪感，並因為先認知到自己的主觀社會地位高低而影響其對於相對剝奪感的感受，但兩者在形成時間序列上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也有可能因為先深刻地感受到相對剝奪感而影響了主觀社會地位認知的高低，也就是說其之間的關係並不只有單方向的，反過來說也得以有個合理的解釋，但在過去研究中並未觀察到這一方向的論述說明，是故本研究將以此邏輯來進行兩者之間關係的驗證，希望能補充兩者之間因果關係的各種可能性。

而為了能夠更深入理解兩者之間的獨立關係，下一節將整理在主觀階級的討論中較為常見的兩種論述取向：唯物論與參考團體理論，並說明這兩種論述建構主觀階級的邏輯與過程，透過對於兩者觀點的解析來發現其中的不足，並以這種不足來說明相對剝奪感和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獨立關係存在的可能性。

第三節 唯物論與參考團體理論脈絡及其影響

在探討主觀階級的研究中大致上有兩個比較常見的論述，前者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為首的唯物論，後者則是從偉伯的身份團體論述中所衍伸出的參考團體理論，在上文所提及的各類背景研究中也時常依照這兩種脈絡來探討主觀階級的變化。下文將分別簡介這兩種論述的主要脈絡與觀點，以方便比較兩者的異同與遺漏之處。

唯物論的觀點認為個人的主觀階級是由客觀現實所構成，其中又以客觀階級的區別影響最為深遠。支持唯物論研究脈絡的人以馬克思主義者為主，其認為個人的客觀境遇先於個人的主觀意識，唯有受到客觀環境的刺激與經驗才有能做出反應之個人意識與相對應感受。此研究脈絡特別強調家庭背景、收入與教育程度等社會背景決定了客觀階級的高低，同時也因為客觀階級的不同而導致個人主觀階級的分化，並使其逐漸趨同於自身所處之客觀階級所在的位置，上文所提的研究大部分都採取此研究脈絡來進行（黃毅志 1999；林宗弘 2009；謝雨生、黃美玲 2012）。

而參考團體理論則是認為主觀階級的形成除了會由物質條件與客觀階級所影響外，仍有其他的可能性。而此論述最重視的可能性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比較，其核心論點在上文中有所提及，即是 Merton 在研究 *The American soldier* 一書時所採用的理論脈絡，也就是假設個人在透過與不同的他人和團體間的相互比較下，其感受將會有所不同（Merton and Lazarsfeld 1950）。參考團體理論對於主觀階級的認識也可以從這種脈絡中得到解釋，簡而言之，個人在透過與不同的他人和團體互動的過程中，會不斷調整自己的感受與認知，且隨著可參考的人或團體越多，所能得知的比對資訊上限與下限也逐漸拉大，使得對照者對自身處境的認知也將趨於中庸，連帶著主觀社會地位的認知也逐漸趨中（Evans, Kelley and Tarki 1992；Oddsson 2010），而資訊的流通性與社交網絡的範圍在臺灣民眾建構自身的主觀社會地位認知時，其重要性亦不亞於客觀階級（林宗弘 2013）。

然而，這兩種觀點仍然無法完全解釋在主觀階級或主觀社會地位建構的過程中，某些更潛在因素存在的可能性，其中一個因素即是本研究想要討論的相對剝奪感。唯物論與參考團體理論兩者雖皆為主觀階級討論中極為有效的論述，但都有其侷限性存在，即其論述都必須各自專注在主要的自變數上，也就是客觀階級與參考團體兩大主軸上，也就無法將個人心理層次的變數作為研究的主軸。但就如同上文所示，階級意識的存在除了客觀環境的落差外，勢必也包含了個人與他者之間的比較與衍伸出的相對感受，就如同馬克思對於房子的比喻一般，且在過

去的研究中亦有提到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存在負相關的證據 (Pettigrew et al. 2008)，因此，本研究認為此一感受所導致的主觀階級變化可能並不遜於社會學今日所談的客觀階級或參考團體等客觀因素。

另外，亦有研究指出兩者對於功績主義認同和相對剝奪感受之間關係的影響，以及相對剝奪感和主觀社會地位之間關係的影響可能也是存在的。在客觀階級方面，已有許多文獻都曾指出，對於那些處於弱勢的族群或階級者而言，功績主義的觀念將會內化到他們的價值觀之中，換言之，處於社會下層階級者會更相信個人的努力與成就決定他們的身份和地位，並試圖透過這個想法來合理化他們如今較為不利的社會處境 (Csepeli et al. 2004; McCoy et al. 2013; Wiederkehr, Virginie, Silvia and Céline 2015)，因此，處境較差的下層階級者在功績主義認同對於相對剝奪感的負向影響上是較其他階級者來得高的，且相對剝奪感也因為身處於下層階級者的感受較為強烈 (林宗弘 2013)，而使其在主觀社會地位的負向影響效果上較其他階級者來得高；而在參考團體理論方面，則因為有越多能夠參考的他人資訊，便會使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認知越是強烈，使得功績主義認同和相對剝奪感的感受程度逐漸趨於中庸 (林宗弘 2013)，因此兩者的影響效果會因能夠參考的團體或他人越多而越低。

綜合上述所言，本研究將客觀階級與作為測量參考團體多寡的社交網絡規模作為交互變數，同時檢驗目前社會學中較常提及的兩個概念，在功績主義認同對於相對剝奪感的影響效果中，以及相對剝奪感所造成的主觀社會地位變化之間是否有干涉其效果強弱的作用，以了解過去鮮少討論到的意識形態、個人感受與主觀社會地位認知三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與變化模式。

下一節將提及功績主義和主觀社會地位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與相對剝奪感和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相同，兩者之間的關係並未於過去的研究中被重視，但兩者之間確實是可能存在一定的關聯性。本研究也將會回顧過去文獻所提之脈絡，並為兩者在本研究中關係的連結做一個簡短說明。

第四節 功績主義和主觀社會地位的關聯

本研究認為功績主義的認同不僅和相對剝奪感之間存在獨立關係，其和主觀社會地位之間應也有可能存在一部份的關聯。然而，就如同上文所提之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的關係，功績主義認同和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同樣鮮有直接的討論，但其之間也並非毫無關聯。過去曾有研究透過路徑分析的方式來理解 1991 年與 1996 年間，東、西歐和美國三個國家民眾各自對於政府與市場機制的信任，發現主、客觀的社會地位以及功績主義的認同對於市場和政府機制的信任有著重要的影響 (Csepeli et al. 2004)，其中主觀社會地位與功績主義之間確實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同樣地，本研究認為功績主義的認同未必後於主觀社會地位的認知，其之間的因果關係仍可能是反向的，即個人對於「努力就會成功」這一信念的認同將有助於提升個人對於自己社會地位的認知，因功績主義的信念所提供的並不僅是一套判斷報酬是否合理的價值觀，亦有可能為個人帶來較為正向的自我認知，換言之，若相信自己努力就能成功，就會認為至今的成就是自己努力的成果，自然較不會否定自己的社會地位，甚至有可能因為具有不輸他人的自信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認同，其結果就會呈現出主觀社會地位將會有提高的趨勢。

下一節將整合上文對於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三者之間關係的預設，並在討論之中加入客觀階級與社交網絡規模，為上述三者之間的關係變化提供較為合適的說法。而後，這些變數之間的連結將形成本研究欲驗證的假設，且這些假設也終將組織成一組完整的研究架構。

第五節 本研究欲驗證之假設

根據上文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似乎還有待更進一步的驗證，同時，這些驗證的結果也是回答本研究疑惑的重要依據。為此，本研究提出下列三個假設，第一個假設為功績主義假說，其預設個人對於「吃苦就一定能成功」此一功績主義的認同程度越高，將越能減輕

相對剝奪感；第二個假設為相對剝奪感假說，其預設相對剝奪感會影響個人的主觀社會地位的認知，且相對剝奪感越嚴重者，其主觀社會地位將會越低；最後是功績主義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正向關係，即個人若越是認同功績主義的信念，其主觀社會地位將會越高。並且除了將客觀階級與社交網絡規模兩者作為額外控制的自變數，以便討論上述三個假設是否成立外，更將這兩者與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分別構成交互作用變數，觀察在過去眾多研究中所強調的客觀因素是否在前兩個假設中有明顯的調節作用，以補足過去對於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三者之間關係的討論。

一、功績主義假說

過去的研究大多認為相對剝奪感的存在與個人實際境遇和生活經驗有關，但鮮少有人關注到更深層的原因，即作為個人評斷公平標準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在背後運作的可能性。為了能夠驗證這種可能性，本研究假設作為個人公平價值判斷標準的功績主義與相對剝奪感的形成有關，也就是說若個人相信「吃苦就一定會成功」這種可以靠著努力取得自己想要且應有報酬的說法時，就不再會感到被剝奪的話，相對剝奪感就會降低，換言之，對功績主義的認同程度越高者，其相對剝奪感感受就越輕微。

另外，本研究預設功績主義假說的效果對於具有不同社交網絡規模或不同客觀階級處境的人而言，效果將有所不同。對於社交網絡規模較大的人而言，因為能獲得的他人資訊較多，而能使其對於自身處境有較客觀的認識，並讓其對於功績主義的說法持保留態度，其影響力就會變低，換言之，對功績主義的認同程度越高者，其相對剝奪感的感受就越輕微，但此效果將隨著社交網絡中所能接觸人數的增加而有所減弱；對於客觀階級的處境較為弱勢者而言，功績主義的信念較有可能內化於其內在的價值觀中，所以其對於自身處境的想法將會歸咎於其自身能力的不足而非是被剝奪的，因此功績主義假說的情境對弱勢階級者而言效果較

強，換言之，對功績主義的認同程度越高者，其相對剝奪感的感受就越輕微，對於弱勢階級者而言此效果將會增強。

二、相對剝奪感假說

過去在相對剝奪感形成的研究與模型中，仍預設個人因物質差異而感受到的強烈不滿足感終將形成相對剝奪感，並再藉由相對剝奪感的增強影響了個人的認知與行動。但本研究認為相對剝奪感和主觀社會地位的關係除了只是單純的中介外，本身應也存在著獨立的關係，所以本研究將單獨討論兩者的關聯。在過去研究曾指出主觀社會地位越低者，其個人相對剝奪感與團體相對剝奪感將越深刻（Pettigrew et al. 2008），本研究認為此影響並非單一方向，因此以倒反的關係探討其之間的關聯，即假設相對剝奪感的感受越深刻的人，其主觀社會地位就越低。

本研究也預設上述關係對於具有不同社交網絡規模或不同客觀階級處境的人而言，效果也將有所不同。對於社交網絡規模較大的人而言，因為能獲得的資訊較多，而能使其對於自身的社會處境有較客觀的認識，這些認識讓他們認為自己雖比上不足但比下有餘，因此其主觀認知的社會地位將趨於中庸（Merton and Lazarsfeld 1950；Kelley and Evans 1995），換言之，相對剝奪感的感受越深刻者，其主觀社會地位就越低，但此效果隨著社交網絡中所能接觸人數的增加而有所減弱；對於客觀階級為弱勢階級者而言，因其經濟困難的程度相較於其他階級者而言是較高的，其遭遇不僅使其相對剝奪感較為深刻，此一感受同時也讓他們的主觀社會地位相對較低，是故相對剝奪感假說的情境對那些弱勢階級者而言感受將更為強烈，換言之，相對剝奪的感受越深刻者，其主觀社會地位就越低，此效果對弱勢階級者而言將會增強。

最後，儘管過去研究並未直接指出主觀社會地位與功績主義之間是否有所關聯，但本研究認為「吃苦就會成功」此一功績主義的存在不僅對臺灣民眾而言有著文化上的意義，亦可能是形塑主觀社會地位的過程中具有深刻影響力的價值觀，

因相信努力可以成功，所以更能樂觀、積極的面對自己的社會處境，進而對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企圖驗證功績主義認同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並認為兩者之間存在正向關係，即對功績主義認同程度越高的人，其主觀社會地位就越高。

三、小結

本節闡述了本研究將要驗證的三個假設，並期望能透過這些假設的驗證，以更進一步達到探討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並試著透過這些結果來回答本研究在緒言中所提出的三個核心問題，這三個問題分別是：第一，功績主義的認同和相對剝奪感是否有所關聯？第二，主觀社會地位的變化與相對剝奪感之間是否有所關聯？第三，功績主義的認同是否與主觀社會地位的變化有所關聯？

本研究的假設將分作兩部份來分別討論。第一部份為探討功績主義與相對剝奪感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並以社交網絡規模和客觀階級作為額外控制的自變數與交互作用變數，以了解功績主義對於相對剝奪感的獨立影響是否存在，以及過去研究中所重視的客觀因素在這層關係之間是否有顯著的調節作用，並透過下文的分析驗證功績主義假說，以回答本研究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第二部份將探討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同樣也將以社交網絡規模和客觀階級作為額外控制的自變數與交互作用變數，以了解相對剝奪感是如何影響主觀社會地位的變化，並在同一組迴歸模型的分析中觀察功績主義對於主觀社會地位的影響是否顯著，以解答本研究所提出的第二及三個問題。

結合上述的各個假設後的研究架構簡圖則如圖 1 所示，其中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三個主要變數之間的路徑正負號所代表的是關係的正負向；而社交網絡與客觀階級的路徑正負號則代表其交互作用的調節效果，正號代表增強、負號代表減弱。期望透過驗證本研究的假設所得之結果得以擴展未來對

於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以及主觀社會地位這三者研究上的可能性與討論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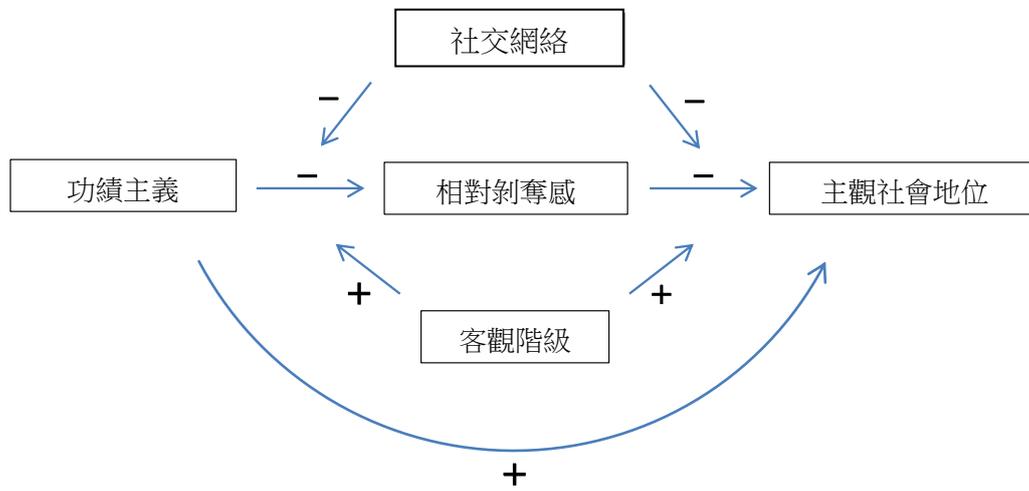


圖 1 本研究企圖驗證之研究架構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資料庫簡介與研究母體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最初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處於 1983 年推動，1985 年成功完成第一次具有全臺灣代表性的調查。1990 年第二期之後，每年都會進行兩份不同主題的獨立問卷調查。兩份獨立問卷調查中，其中一份為每五年就會有的同一主題問卷調查，以彰顯臺灣社會變遷的狀態；另一份則為提供不同的社會科學之學科研究資料而彈性地採用不同主題，並嘗試與國際調查接軌，設計出共同題組以供跨國比較。從 1984 年至今年為止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共完成 29 次的主題問卷，累計有 60 份調查可供使用。本研究選用其中包含最多樣題目的綜合題組問卷作為本研究之資料庫，且為該組最新釋出的 2015 年七期一次。選擇這份資料的原因在於一方面其題目種類豐富，有許多較為適合本研究變數意義的測量題目；另一方面其已是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時間點較為近日的資料，較能以其趨勢來推論現今時間點的狀態。母群體為臺灣地區具有本國國籍且設有戶籍之 18 歲以上人口，並以分層三階段等機率抽取樣本（層級、村里、個人），最終有效問卷份數為 2,031 份。

第二節 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使用量化分析的方式觀察臺灣民眾的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三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預計使用的統計工具為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簡稱 ANOVA）與多元線性迴歸的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簡稱 OLS）。ANOVA 將用以觀察在不同的客觀階級身份者之間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三者的平均數是否有所差異；OLS 模型則是討論在控制其他變數的狀況下，功績主義的認同對於相對剝奪感，以及相對剝奪感對於主觀社會地位變化的影響程度，並再加以控制社交網絡規模與客觀階級的情況下，觀察其之間獨立的關係，最後再加入社交網絡規模、客觀階級兩者分

別和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所構成的交互變數來確認其影響效果的強弱程度變化。

第三節 變數建構

本研究採用的變數有以下幾項：依變數有二，一為相對剝奪感，二為主觀社會地位；自變數有三，一為功績主義、二為社交網絡規模，三為客觀階級；控制變數則分別有性別、族群、年齡、教育程度與經濟困難度等個人背景因素。下列將說明各變數之定義與編碼方式：

一、依變數

（一）相對剝奪感

相對剝奪感雖在過去研究中已有成熟的定義與模型，但其中仍有相當多的層次與細節難以被完整測量與整合（Crosby 1976；Runciman 1993）。所以本研究將相對剝奪感定義為個人在面對社會上財富逐漸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情形下，個人感到相對地被剝奪且無法改變的感受，用以指出較為廣泛且具有階級對立意涵的相對剝奪感受。採用問卷題目為對「現在社會變得有錢人愈來愈有錢，像我這樣的人再怎麼努力也趕不上」此一說法的贊同程度，以測量相對剝奪感的感受程度。其中原始選項共分為非常贊成、贊成、不贊成、非常不贊成、無意見與拒答。本研究將其分作正向與負向分數，即非常贊成為 2 分、贊成為 1 分、無意見為 0 分、不贊成為-1 分，非常不贊成為-2 分，分數為正數時為有較高的相對剝奪感，反之，分數為負數時為有較低的相對剝奪感。不瞭解題意、不知道以及拒答者等無法歸類者皆設為遺漏值。

（二）主觀社會地位

本研究的主觀社會地位測量方法為個人的主觀社會地位階層，也就是指個人認為自己應身處的社會地位排序。實際的排序方法以階層的高低來表示，最高的社會地位者為第十層，最低的社會地位者以第一層來表示。此測量方式雖無法完

整測量到個人的階級認同，但有鑑於過去文獻指出臺灣民眾儘管有意識到階級的存在，但仍無法判斷自身應置於何種階級分類（吳乃德 1994；蕭新煌 1994），且國內外也有許多學者使用此測量方法作為主觀階級認知的測量標準，並證實具有一定的穩定度與可比較性（林宗弘 2013；Kelley and Evans 1995），是故本研究亦將採取此測量方式。此變數的原問卷題目為：「如果整個社會由上而下分為十層，第一層代表最低，第十層代表最高。請問您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屬於第幾層？」，本研究依受訪者回答之層數如實輸入其數字，以使其能直接反映主觀社會地位之層數，而拒答者、跳答者和不知道者皆設為遺漏值。

二、自變數

（一）功績主義

本研究的功績主義定義為個人認為在自由競爭中，對於自己的努力得以獲得相對應報酬或是成功機會的期待，以臺灣的傳統諺語而言類似於對「愛拚才會贏」的認同。採取此定義的理由於上文中已有詳細說明，即一方面考量到此論述與過去研究所探討之自由平等的功績主義信念有高度關聯性（Bell 1995；Csepeli et al. 2004；McCoy et al. 2013），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此概念與臺灣傳統價值觀相符合，故較能有效測量到臺灣民眾對功績主義認同的程度。採用問卷題目為對「一個人只要肯吃苦，就一定會成功」此一說法的贊同程度作為測量對功績主義認同的程度。其中原始選項共分為非常贊成、贊成、不贊成、非常不贊成、無意見與拒答。同相對剝奪感的編碼方式，本研究將其分作正向與負向分數，即非常贊成為 2 分、贊成為 1 分、無意見為 0 分、不贊成為 -1 分，非常不贊成為 -2 分，分數為正數時代表對功績主義有較高的認同，反之，分數為負數時代表對功績主義有較低的認同。不瞭解題意、不知道以及拒答者等無法歸類者皆設為遺漏值。

（二）社交網絡規模

以參考團體理論為背景的相關討論認為個人所能接收到的參考訊息會使個人的社會地位認知或相對剝奪感逐漸趨於中庸（Evans, Kelley and Tarki 1992；Oddsson 2010；Runciman 1993），因此本研究認為個人所能接觸的他人多寡可能影響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以及主觀社會地位三者之間關係的強度。為此，本研究將以個人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的規模來測量其接收到的資訊多寡。採用的原題目為：「請問您平常一天裡面，從早到晚總共大概跟多少人接觸？（包括點頭、打招呼、講話、打電話、寫信、透過電腦網路，對方是認識或不認識的都算。）」。原選項以區間的方式詢問人數，分別為 0-4 人、5-9 人、10-19 人、20-49 人、50-99 人以及 100 人或以上。此變數將取各區間的中位數作為其平均數，即互動人數在 0-4 人者其平均互動人數設為 2 人；5-9 人者平均設為 7 人；10-19 人者平均設為 14.5 人；20-49 人者平均設為 34.5 人，50-99 人者平均設為 74.5 人；100 人以上者平均則取底數 100 人。上述編碼方式不僅能將區間轉換成平均人數來比較，亦能表現出個人所能接觸之人數多寡。而本題也於過去研究的論述中證實是能有效測量個人社交網絡所呈現之社會資本的指標（林宗弘 2013；Fu 2005）。

（三）客觀階級

為能與前人的經驗研究對話，本研究的客觀階級位置分類將參考林宗弘（2013）的分類標準，依照資本的有無以及管理權威、技術層次高低兩大特徵，將階級位置分作四類。第一類者為同時擁有資本（即自己經營事業）且僱用他人的資本階級；第二類者為擁有資本但未僱用他人的自營作業者；第三類者為不擁有資本但具有管理權威（有管理他人），或具有專業技術之職業（ISCO 編號小於第 4 類）的新中產階級；第四類者則為不擁有資本也不具有管理權威的非專業技術之職業（ISCO 編號大於第 4 類者）的非技術工人，而不屬於上述類別的學生、家庭主婦以及已退休者為非勞動力。最後，僱用、管理人員不定者與拒答者因無法歸類為上述任何一個類別，將其編為遺漏值。

三、控制變數

控制變數多為基本的個人背景因素，如性別、族群、年齡、教育程度與經濟困難度。性別將以虛擬變數處理，設男性為 1 女性為 0。族群有閩南、客家、原住民與外省人，以父親所屬之族群來判斷本人的族群，並使用虛擬變數分別處理之，分析時將以閩南人作為對照組。年齡將從調查問卷中受訪者所填之出生民國年判斷，以民國 104 年減去其出生民國年得知。教育程度將轉換成教育年數來處理，未就學為 0 年、國小為 6 年、初中職為 9 年、高中職為 12 年；五專、二專、軍警專修班以及空專為 14 年、三專為 15 年；大學、空大與技術學院為 16 年、碩士為 18 年、博士為 22 年。最後，為控制經濟狀態所帶來的影響，將以經濟困難度作為經濟層次的控制變數，以「您覺得您和您的配偶現在的收入，夠不夠應付生活所需？」的足夠程度為測量標準，依照其足夠程度（很足夠、足夠、差不多、有點不夠、很不足夠）分別編為 1 至 5 分，分數越高經濟困難度越高。

第四節 變數檢視

表 1 為本研究所使用變數的基本統計值，有效樣本為符合本研究所有變數定義下的非遺漏值，表中類別變數表示其比例，連續變數則以平均數表示其趨勢。在依變數的部分，主觀社會地位的平均層數落在 4.60 層，此數值接近中間階層，且選擇第 5 和第 6 層者約佔了有效樣本數中的五成（51.30%），顯示臺灣民眾大多認為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處於中間階層，此現象與參考團體理論所認為的趨勢相似，因資訊流通管道的發達與社交網絡的擴張以利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比較，因此導致社會整體主觀社會地位的認知是趨中的（林宗弘 2013；Oddsson 2010）。有效樣本整體的相對剝奪感平均數為 0.50 分，其數字為大於中間值 0 的正數，也就是說臺灣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受很可能是偏高的，這也代表過去研究指出臺灣經濟的衰退與其帶來的意識形態改變所造成的「失落年代」仍可能持續著（林宗弘 2013）。至於相對剝奪感與功績主義、社交網絡規模和客觀階級三者之間的關

聯性，以及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的變化之間是否還有更深刻的意義將於下文的分析中釐清。

表 1 本研究變數之描述性統計

| 變數名稱 | 百分比／平均數 | 下限 | 上限 | 有效樣本數 |
|-----------|---------|----|-----|-------|
| 主觀社會地位（層） | 4.60 | 1 | 10 | 1899 |
| 相對剝奪感（分） | 0.50 | -2 | 2 | 1899 |
| 功績主義（分） | 0.39 | -2 | 2 | 1899 |
| 社交網絡規模（人） | 35.08 | 2 | 100 | 1899 |
| 階級位置 | | | | |
| 資本階級 | 4.79 | 0 | 1 | 1899 |
| 自營作業者 | 9.27 | 0 | 1 | 1899 |
| 新中產階級 | 24.33 | 0 | 1 | 1899 |
| 非技術工人 | 31.23 | 0 | 1 | 1899 |
| 非勞動力 | 30.38 | 0 | 1 | 1899 |
| 性別 | | | | |
| 男性 | 52.55 | 0 | 1 | 1899 |
| 女性 | 47.45 | 0 | 1 | 1899 |
| 族群 | | | | |
| 閩南人 | 77.20 | 0 | 1 | 1899 |
| 客家人 | 11.43 | 0 | 1 | 1899 |
| 原住民 | 1.63 | 0 | 1 | 1899 |
| 外省人 | 9.74 | 0 | 1 | 1899 |
| 年齡（歲） | 46.78 | 19 | 94 | 1899 |
| 教育程度（年） | 12.06 | 0 | 22 | 1899 |
| 經濟困難度（分） | 2.88 | 1 | 5 | 1899 |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七期一次綜合問卷

在自變數的部分，有效樣本中功績主義認同程度平均分數為 0.39 分，其分佈和相對剝奪感相同，同樣都有著分數偏高的趨勢，形成此趨勢的原因可能是臺灣民眾仍傳承並認同傳統觀念，認為辛苦總會有收穫，即使現實環境可能並非如此樂觀。社交網絡規模的部分可以發現臺灣民眾每日平均所能接觸到的人數約為 35 人，在一日之中能與如此多的人交流似乎暗示著交通、資訊等科技的發達有效地擴展了個人的社交網絡規模。在各個客觀階級的比例上，雖然新中產階級僅佔所有有效樣本中的比例約是 2.5 成，而非技術工人則是超過 3 成，以比例上來說新中產階級者並未較非技術工人來得多，但在排除了非勞動力後則可發現新中產階級佔了 34.95% (462 / 1322)，而非技術工人佔了 44.86% (593 / 1322)，比過去研究於 2010 年所統計的 26.74%、51.62% 的差距還來得小 (林宗弘 2013)，此比例之間的消長也與過去研究所發現到的階級結構變化趨勢相符，即隨著臺灣後工業化的社會結構日漸成熟，新中產階級的比例將有所提升，逐漸取代過去工業社會中以從事代工或體力活為主的非技術工人與「黑手變頭家」的自營作業者 (林宗弘 2009；林宗弘 2013)。

在控制變數的部分，有效樣本內的男性較女性來得相對地多，與總人口比率相比稍有差異 (臺灣當年男性總比例為 49.86%，女性為 50.14%)；有效樣本內的族群仍以閩南人為大宗，其他族群所佔的比例相對而言較少，但皆與實際臺灣人口比例相近 (臺灣當年總體比例上客家人約佔 14.2%；外省人約佔 7%；原住民約佔 2.3%)；有效樣本的平均年齡大約是 47 歲，其中最低齡者為 19 歲而最高齡者為 94 歲；有效樣本的平均教育年數為 12.06 年，也就是說平均的教育程度約在高中畢業；有效樣本的的經濟困難度平均分數則是在總分為 5 分的狀態下呈現偏高的 2.88 分，顯示對於臺灣民眾而言經濟資源上的不滿足仍可能是一個潛在的問題。

第四章 分析結果

本章將分析並驗證上文所提出的問題與假設。前三個小節將分別討論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在臺灣社會中長時間的演變與其在各客觀階級之間的差異，以此瞭解臺灣民眾對於這三者認知的真實樣貌之外，亦可為第四節的假設驗證提供更詳細的背景資訊與新的發現；第四節為功績主義假說與相對剝奪感假說的驗證，將透過解讀迴歸分析之結果以瞭解本研究的核心假設是否成立，並於本章的最後一節整合本章之發現，並為本研究的提問提供可能的解答。

第一節 功績主義的弱化與差異

一、臺灣社會整體的功績主義認同轉變

為能進一步了解臺灣民眾功績主義認同的變化趨勢，本研究整理了過去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綜合組問卷中，對於「一個人只要肯吃苦，就一定會成功」一說贊成與否的回答趨勢。下文圖 2 即為整理過後的長條圖，左方藍條為非常贊成與贊成者合計之比例，右方紅條為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合計之比例。從圖 2 中可以發現雖然從 1985 年至 2015 年間贊成功績主義者的比例始終多於不贊成者，但兩者的比例差距卻隨著時間演進而逐漸減少，贊成者的比例從 1985 年的 90.8% 下降到 2015 年的 62.5%，同時不贊成者比例則從 9.1% 上升到 35.5%，其差異之大顯示出臺灣民眾對於功績主義的認同正逐漸弱化。

過去研究也發現到臺灣民眾對於功績主義的認同確實正逐漸下降，且其中還存在了一些結構性的因素。一方面有研究指出雖然臺灣民眾對於「一個人只要肯吃苦，就一定會成功」此一功績主義抱持著較為樂觀且認同的態度者居多，但經濟環境的不穩定仍導致不認同功績主義者的比例逐年上升，並使工作價值觀的傾向從積極正面的挑戰心態轉變成為以收入與穩定工作為主的保守態度（蔡明璋 2012），也就是說儘管功績主義仍然受到臺灣人重視，但不贊成者的增加與工作價值觀的保守化很顯然與本研究所發現的趨勢雷同；另一方面針對整體社會意識

形態的研究則指出功績主義的弱化是一種複合式的結構轉變所造成的，這些結構轉變包含產業外移、經濟衰退、文憑貶值等（林宗弘 2013；林宗弘 2015），顯示臺灣社會大眾對功績主義認同的弱化趨勢確實存在，而這一趨勢與臺灣經濟環境惡化所導致的付出與報酬不符之現象息息相關，且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比前人研究更接近現今的時間點，顯示此一趨勢可能正持續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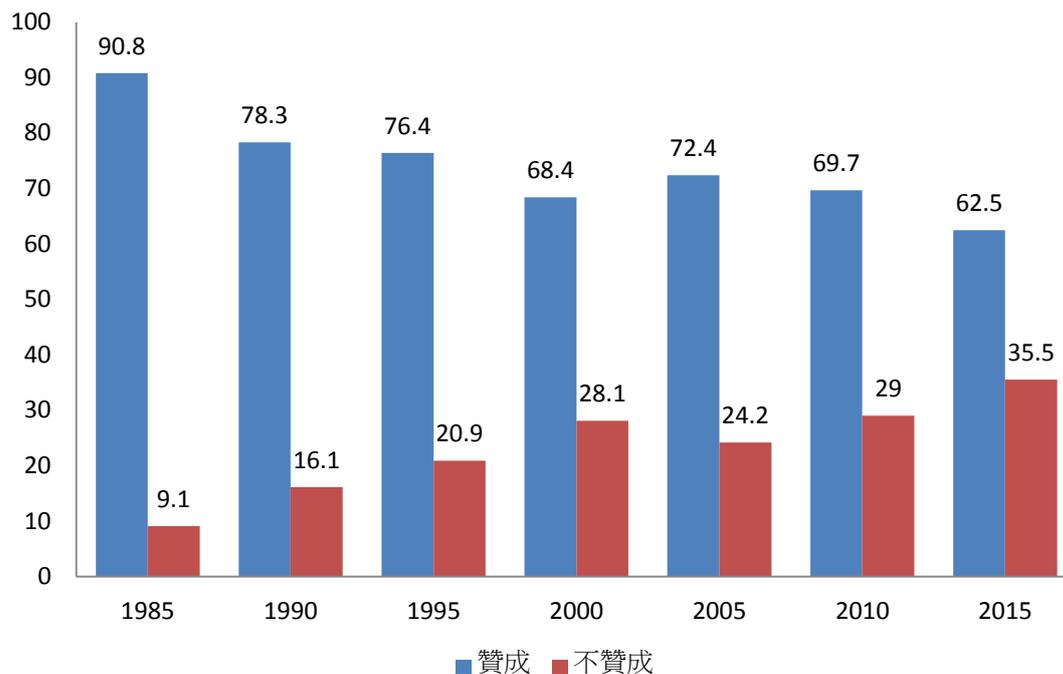


圖 2 臺灣民眾對「一個人只要肯吃苦，就一定會成功」贊成與否，1985-2015 年

二、功績主義認同的差異

再者，本研究認為不僅需要理解至今為止臺灣民眾功績主義認同的變化，亦需討論的是：功績主義的認同程度在不同階級身份的人之間是否有所差異？這個差異是否顯著？解答這些問題不僅有助於回答本研究的疑惑之外，亦能為下文將要驗證的功績主義假說提供一些背景資訊。

下文表 2 顯示各客觀階級之間對於功績主義的認同程度差異，其數值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判定水準，是故能明確地說在各客觀階級者之間對於功績主義的認同程度是不完全一致的，且可從中發現新中產階級者相較於其他階級的人而言，對功績主義的認同程度是最低的，而自營作業者則是最高的。

過去研究也曾對不同時期臺灣民眾的功績主義認同進行探討，亦發現新中產階級是所有階級中較不相信功績主義的階級。為何會有如此的不同？該研究認為資本家與新中產階級者因有較多機會得以繼承上一輩的資本與資源，並擁有更多樣的社會網絡以獲得更完整之資訊，進而使其認知到努力並非成功的唯一路徑，累積的資源、人脈與機會可能才是成功的關鍵（林宗弘 2013）；而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地方為自營作業者對於功績主義的認同程度是所有階級中最高的，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本研究認為可能在於自營作業者的工作內容中，大多都只能仰賴自身的能力與勞動，同時還必須負擔盈虧的風險，換言之，正是因為他們的收穫和自己的努力與能力息息相關，導致其對於「個人只要能吃苦，就一定會成功」的功績主義信念認同相較其他階級者而言來得更為強烈。

表 2 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於各階級之間的差異（N=1899）

| 變數 | 功績主義(StD) | 相對剝奪感(StD) | 主觀社會地位(StD) |
|-------|---------------|---------------|---------------|
| 資本階級 | 0.48(1.32) | 0.37(1.25) | 5.33(1.72) |
| 自營作業者 | 0.60(1.21) | 0.68(1.15) | 4.19(1.90) |
| 新中產階級 | 0.06(1.24) | 0.27(1.25) | 5.19(1.41) |
| 非技術工人 | 0.37(1.26) | 0.60(1.17) | 4.34(1.67) |
| 非勞動力 | 0.60(1.18) | 0.53(1.20) | 4.40(1.87) |
| 總體樣本 | 0.39(1.25)*** | 0.50(1.21)*** | 4.60(1.75)*** |

註：P<0.05*；P<0.01**；P<0.001***

第二節 相對剝奪感的增長與差異

一、臺灣社會整體的相對剝奪感演變趨勢

下文圖 3 為同樣為綜合組問卷中，臺灣民眾對於「現在社會變得有錢人愈來愈有錢，像我這樣的人再怎麼努力也趕不上」，這一說法贊成與否的比例於 1995 年至 2015 年間變化的長條圖。從圖中可以發現臺灣民眾在相對剝奪感受上的贊成與不贊成比例之間差異越加擴大，儘管比例的變化並未如功績主義認同的弱化那般顯著，但對於此論述感到贊同者的比例從 1995 年的 59.6% 上升到 2015 年的

66.6%，不贊同者的比例雖有短期增加的趨勢，但於 2015 年又下降到歷年來最低的水準（30.4%），本研究認為此一趨勢並非只是偶然。

過去研究則顯示這種現象很可能與社會整體的不平等有很大的關聯性。國外的研究曾指出隨著國家內部的社會不平等越加嚴重，整個社會所感受到的相對剝奪感將會越顯著（Yitzhaki 1979；Hey and Lambert 1980）。而臺灣受到貿易國際化的影響之下，資方與新中產階級得以藉由轉投資海外來獲得最佳的報酬，但其利益並未回饋到臺灣本國的勞工身上，且產業升級帶來的產業別收益差、減稅等經濟環境的變化下，又使得既得利益者所能獲得的利益更進一步增加，階級結構的固化與貧富差距的擴大同時導致了相對剝奪感的上升（林宗弘 2013；林宗弘 2015）。作為對照，圖 4 為臺灣歷年來吉尼係數的變化，可以發現吉尼係數逐年升高並於 2010 年達到高峰，在 2015 年才下降到了 20 年來最低點，但總體來說貧富差距的印象已深入人心，臺灣民眾對於的經濟衰退與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滿似乎仍直接地反映在相對剝奪的強烈感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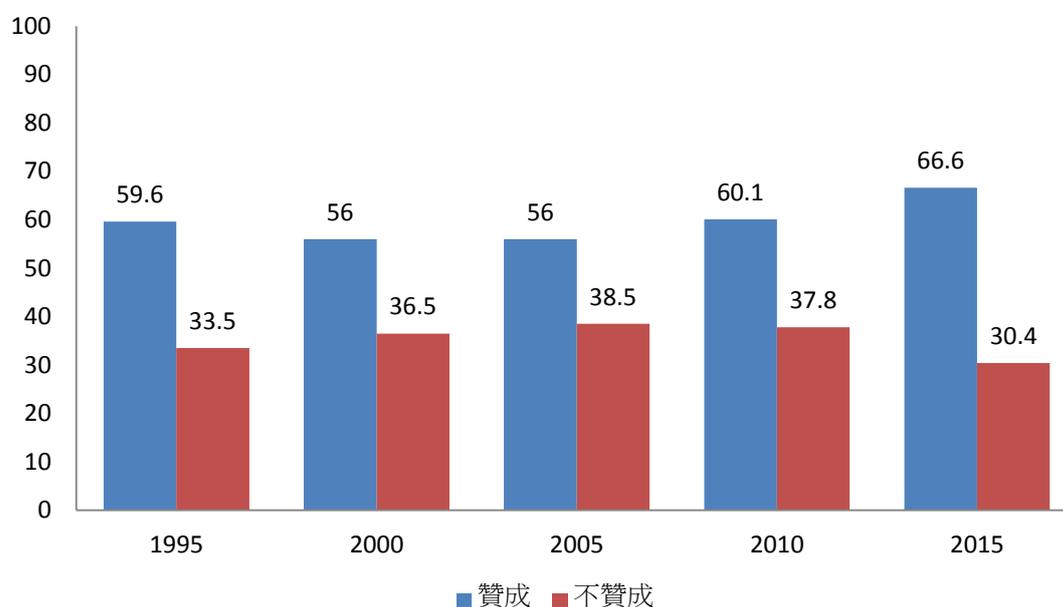


圖 3 臺灣民眾對「現在社會變得有錢人愈來愈有錢，像我這樣的人再怎麼努力也趕不上」的說法贊成與否，1995-201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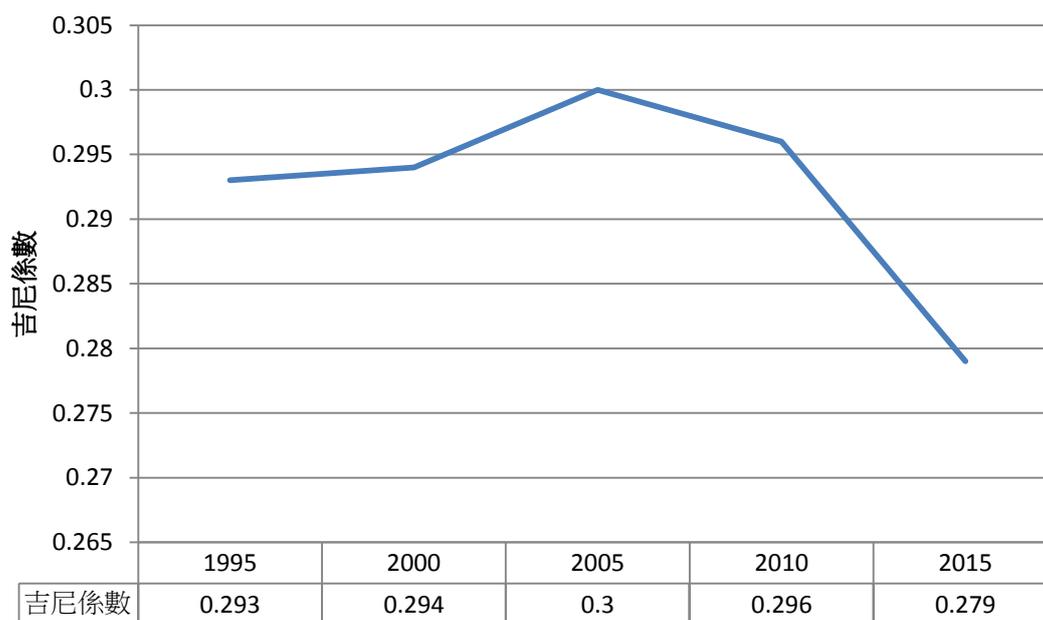


圖 4 臺灣每人所得（每戶所得 / 戶量）之吉尼係數折線圖，1995-2015 年

二、相對剝奪感的差異

於上文的表 2 中顯示在各客觀階級者之間相對剝奪感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判定水準，是故能明確地說各個客觀階級之間在相對剝奪的感受上是不完全一致的，並可從中發現相較於其他階級而言，自營作業者的相對剝奪感的平均分數是最高的，非技術工人次之，新中產階級的相對剝奪感受則是所有階級中最底的。此一趨勢若與功績主義的差異一同討論的話可以發現，自營作業者和新中產階級各自呈現出較為特別的趨勢：相對於其他階級者而言，新中產階級既對功績主義較為不認同，亦較不認為自己會因為受到剝奪而無法追趕上有錢人；而自營作業者卻是最為認同功績主義，但相對剝奪感又是相對較高的。

新中產階級的這一特質似乎與他們為臺灣社會與經濟結構轉型後的既得利益者有所關聯。在上文的討論中不斷地提到，新中產階級者的優勢在於擁有透過繼承既有資源與人脈所磨練出的特殊技術，並再以其技術專長佔據現今社會中大多數的高技術專長職位或管理階層，同時，持有高度技術與知識使他們在面對社會的變遷有十足的餘裕與把握，也就不易認為自己是被剝奪或是追趕不上有錢人。

但一方面深知自己仍是透過繼承的方式贏得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其社交網絡時常涉及資本家與股東等更富有的投資者，讓這些新中產階級者們相對於其他階級者而言又更不認同功績主義的論述（林宗弘 2013）。

而相較於處於優勢的新中產階級而言，自營作業者在功績主義的認同和相對剝奪感的感受上則是呈現出近乎相反的樣貌。其結果的成因與上文所提相似，即自營作業者所必須付出的勞力與心力相較於其他階級而言可能是較高的，但同時也必須承擔盈虧的風險。所以其雖然能夠同意功績主義的論述，但在現實生活上卻很可能是相對艱苦且難以獲得滿意報酬的，因此自營作業者在相對剝奪感的感受上相較於其他階級者來得深刻是可以理解的。

本研究預設那些處於弱勢階級者會是功績主義假說中的交互作用最為顯著的一群，而從上文的說明中可以知道自營作業者和非技術工人兩者在經濟上是較為弱勢的兩個階級，且其在功績主義的認同和相對剝奪感的感受上確實也呈現出較為特殊之處，如自營作業者相較於其他階級而言，對功績主義的認同程度較高且相對剝奪感受同時也較高，而非技術工人則是在相對剝奪感的感受上有較高的趨勢。然而，這兩者是否真的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將在下文功績主義假說的驗證過程中關注這兩者的變化，以期能得到更多資訊。

第三節 主觀社會地位認知的變化與差異

一、臺灣社會整體的主觀社會地位認知變化

下文的圖 5 為臺灣民眾歷年來主觀社會地位的平均數變化。由於綜合題組問卷中直到 2010 年才有詢問受訪者主觀社會地位的答題，所以 1992 年至 2012 年間的資訊將採用社會階層組問卷的資料，其中 1992 年至 2007 年間的題目問法雖稍有不同，但其差異不大仍可進行比較與討論。從圖中可以發現到臺灣民眾在近 20 年間主觀社會地位的平均數差距並不大，皆停留在第 4-5 層之間。顯示長期而言，臺灣民眾主觀社會地位的認知趨勢穩定且大部分都是趨於中間階層的。

此結果與過去在主觀階級上採用馬克思主義分類模式的研究所得之結果並不相同，反而顯示出臺灣民眾在社會地位的主觀認知上有較為穩定的趨勢。過去研究指出臺灣民眾的階級認同逐漸偏向勞工與下層階級，顯示臺灣民眾在面臨各種經濟衝擊的情況下，階級的認同逐漸趨向下層的事實（林宗弘 2013；林宗弘 2015）。然而，主觀社會地位的變化趨勢並未是如此，反而顯示出臺灣社會整體的社會地位認知大多呈現趨中且穩定的狀態。這與許多國外文獻的發現較為相近，而這些研究認為社會地位的認知與認同是由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比較之下所構成的，人們在藉由處境的不斷對照下，會意識到自己身處的社會地位雖比上不足但比下有餘，進而使大部分人都會自認為是中間階層（Kelley and Evans 1995；Oddsson 2010）。另外，也有研究指出，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等國家內部因素，雖會使不同國家之間的主觀社會地位分佈狀況有所差異，但絕大多數仍是以自認為是中間階層者居多（Evans and Kelley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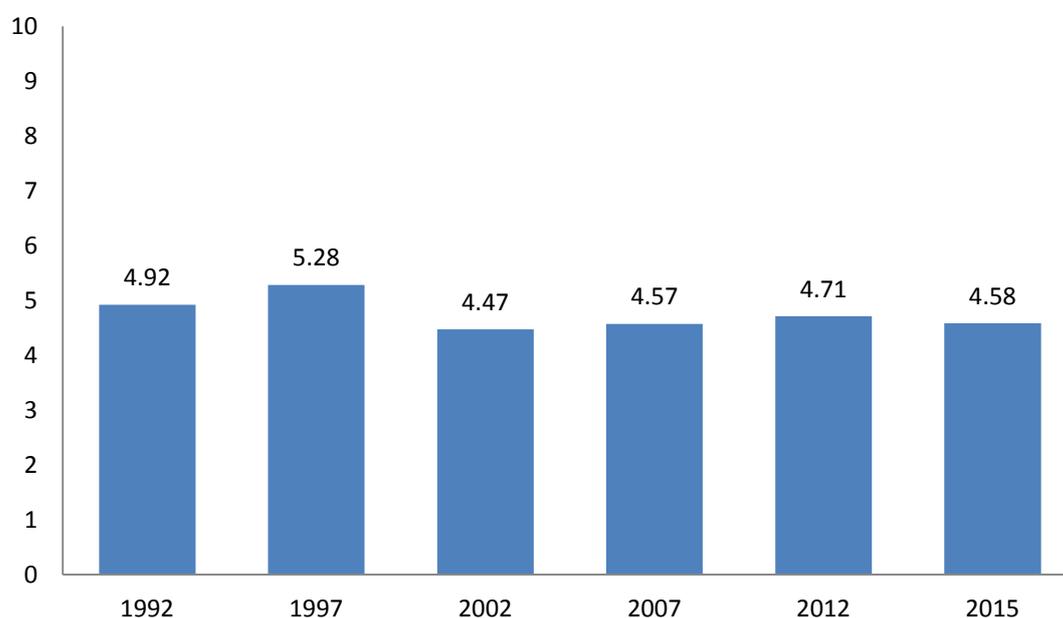


圖 5 臺灣民眾歷年主觀社會地位的平均數，1992-2015 年

二、主觀社會地位認知的差異

於上文的表 2 中顯示在各客觀階級者之間，主觀社會地位的認知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判定水準，是故能明確地說各個客觀階級者之間在主觀社會地位的

認知上是不完全一致的，並可從中發現除了非技術工人有著相對較低的主觀社會地位之外，自營作業者同樣也呈現出最低的主觀社會地位，而新中產階級則表現出較高的社會地位認知。

新中產階級與自營作業者兩者在社會地位認知上的差距又與上文的討論相呼應。新中產階級者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認知是因具有專業知識、階級繼承等優勢條件下形塑而成的；但自營作業者的社會地位認知低下則是因本身就處於缺乏資本或經濟拮据的狀況無法僱員，以致於其必須同時從事管理與生產兩方面的勞動，增加了自身勞力負擔並同時承擔盈虧壓力，致使其感受到自身的勞動價值低落而自貶身價；而從社會結構的層面來說，則是因為臺灣整體的創業環境相較於過去已經變得艱難許多，加劇的商業競爭使得勞動者自行創業的動力降低，同時也讓已創業的自營作業者營業狀況雪上加霜（林宗弘 2015）。

從上一小節與本小節的結果中，仍可發現自營作業者與非技術工人兩者和其他階級者之間，在相對剝奪感和主觀社會地位認知上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同樣也將持續關注兩者在相對剝奪感假說的驗證過程中交互作用的變化，以利獲得更多發現。

第四節 功績主義假說與相對剝奪感假說的驗證

上文探究了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在臺灣社會中長期的演變，以及三者在同一時期中於各不同階級身份者之間的差異。下文將延續這一結果，透過驗證本研究提出的三個主要研究假設：功績主義假說與相對剝奪感假說，以及功績主義與主觀社會地位的關聯，以繼續深入探討三者之間的關係，並嘗試和過去的研究經驗連結，找出這些關聯性之間存在的原因與現象，為本研究提出的問題提供可能的解答。

一、功績主義假說的檢驗

下文的表 3 為驗證功績主義假說的多元迴歸模型。本次迴歸分析有六個模型，第一個模型將單獨討論功績主義如何影響相對剝奪感；第二個模型則是加入控制變數後，觀察功績主義認同對於相對剝奪感的淨影響力；第三個模型為加入社交網絡規模與客觀階級後，觀察功績主義對於相對剝奪感的影響力是否仍然顯著；最後，第四、第五及第六個模型將加入本研究預設的交互作用變數，即社交網絡規模和功績主義，以及各個客觀階級位置和功績主義兩類的交互作用變數，並觀察這兩者在功績主義和相對剝奪感之間的關係中是否存在調節效果。

首先討論的是功績主義對於相對剝奪感的影響於各個模型中的變化。從模型一中可以看到若只討論功績主義對於相對剝奪感的影響，可以發現其係數達到本研究預設之顯著水準；在模型二多控制了背景因素後，發現功績主義的係數不論是顯著性還是影響力都有顯著的提高（係數增加 0.066，t 值增加 2.990），且其之間的關聯性是負向的，也就是說在控制了其他變數的情形下，當個人對於功績主義的認同分數每提高 1 分時，其相對剝奪感的感受將會降低 0.109 分。值得一提的是，模型一和模型二之間 R^2 的差異（兩者之間 R^2 差了 0.099）表現出功績主義雖和相對剝奪感之間有顯著的關聯性，但其所提供的模型解釋力並未如客觀的個人背景因素來得高，換言之，功績主義對於相對剝奪感的影響可能未如客觀環境來得大；在模型三中再加入了社交網絡規模與客觀階級兩者之後，兩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沒有減弱，此結果也驗證了本研究功績主義假說的預設，並和過去的研究所發現的結果一致。大致上而言，相對剝奪感的感受不僅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個人對於公平與合理的判斷、自身的經驗以及價值觀等主觀認知也是同樣重要的（Crosby 1976；Ellemers and Bos 1998；Smith al. 2012），而功績主義作為整個社會定義何謂公平與合理的意識形態，更是讓社會中的個人在公平、合理競爭的理念上有共同的認知（Bell 1995），因此對於功績主義的認同與相對剝奪感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性也就不足為奇。

表 3 相對剝奪感影響因素之 OLS 迴歸分析 (N=1899)

| 變數名稱 (對照組) | Model1 | Model2 | Model3 | Model4 | Model5 | Model6 |
|----------------|---------------------------------|---------------------------------|---------------------------------|-----------------------|---------------------------------|---------------------------------|
| 功績主義 | -0.043 ⁺ (-1.944) | -0.109*** (-4.934) | -0.105*** (-4.773) | -0.139*** (-4.110) | 0.095 (1.048) | 0.051 (0.513) |
| 社交網絡規模 | | | -0.000 (-0.483) | -0.001 (-0.783) | -0.000 (-0.505) | -0.001 (-0.748) |
| 客觀階級 (資本階級) | | | | | | |
| 自營作業者 | | | 0.117 (0.787) | 0.120 (0.787) | 0.150 (0.933) | 0.145 (0.899) |
| 新中產階級 | | | 0.135 (1.007) | 0.142 (1.058) | 0.229 (1.631) | 0.226 (1.611) |
| 非技術工人 | | | 0.268* (2.030) | 0.272* (2.061) | 0.371** (2.659) | 0.367** (2.627) |
| 非勞動力 | | | -0.058 (-0.434) | -0.050 (-0.372) | 0.050 (0.351) | 0.043 (0.303) |
| 社交網絡規模*功績主義 | | | | 0.001 (1.323) | | 0.001 (1.045) |
| 自營作業者*功績主義 | | | | | -0.093 (-0.805) | -0.076 (-0.655) |
| 新中產階級*功績主義 | | | | | -0.228* (-2.267) | -0.220* (-2.177) |
| 非技術工人*功績主義 | | | | | -0.223* (-2.276) | -0.209* (-2.112) |
| 非勞動力*功績主義 | | | | | -0.221* (-2.224) | -0.194 ⁺ (-1.891) |
| 性別 (女性) | | | | | | |
| 男性 | | -0.086 (-1.593) | -0.089 ⁺ (-1.655) | -0.087 (-1.615) | -0.092 ⁺ (-1.705) | -0.091 ⁺ (-1.680) |
| 族群 (閩南人) | | | | | | |
| 客家人 | | -0.127 (-1.530) | -0.135 (-1.631) | -0.135 (-1.634) | -0.131 (-1.584) | -0.132 (-1.590) |
| 原住民 | | -0.446* (-2.142) | -0.461* (-2.224) | -0.460* (-2.217) | -0.434* (-2.089) | -0.434* (-2.090) |
| 外省人 | | -0.158 ⁺ (-1.751) | -0.143 (-1.586) | -0.143 (-1.585) | -0.137 (-1.514) | -0.136 (-1.509) |
| 教育年數 | | -0.032*** (-3.809) | -0.030*** (-3.387) | -0.031*** (-3.465) | -0.029*** (-3.319) | -0.030*** (-3.365) |
| 年齡 | | 0.013*** (6.186) | 0.016*** (7.282) | 0.016*** (7.287) | 0.015*** (7.206) | 0.015*** (7.174) |
| 經濟困難度 | | 0.157*** (6.152) | 0.153*** (5.927) | 0.152*** (5.881) | 0.152*** (5.903) | 0.151*** (5.862) |
| 常數 | 0.512*** (17.630) | -0.028 (-0.136) | -0.278 (-1.127) | -0.259 (-1.049) | -0.373 (-1.494) | -0.348 (-1.387) |
| R ² | 0.002 | 0.111 | 0.121 | 0.122 | 0.125 | 0.126 |

註：P<0.1⁺；P<0.05*；P<0.01**；P<0.001***，雙尾檢定，括弧內為 t 值

然而，雖在模型四中僅多加入社交網絡規模交互作用變數的狀況下，功績主義對於相對剝奪感的影響並未產生顯著變化，但在模型五和模型六中卻可以發現在加入各個客觀階級的交互作用變數後，功績主義對於相對剝奪感的影響將不再顯著，可見客觀階級的交互作用變數並未對兩者之間的關係有明顯的調節作用，且還因為客觀階級和功績主義的交互作用變數具有共線性而使功績主義的係數不再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再者，從模型四至六中可以觀察到社交網絡規模和客觀階級在兩者關係上的調節作用是不存在的。從模型四中可以發現不論是社交網路規模本身還是其交互作用變數，對於相對剝奪感的影響皆不顯著，顯示社交網絡規模在功績主義和相對剝奪感之間的關係中並不存在調節作用；客觀階級的交互作用變數部分在模型五和模型六中皆可發現相對於資本階級而言，新中產階級、非技術工人和非勞動力者在交互作用變數的影響上是呈現顯著的負向，也就是說這三者相較於資本階級而言，更容易因為相信「吃苦就一定能成功」此一功績主義信念而使相對剝奪感降低。但如上文所言，功績主義的係數在此兩個模型中並未有顯著效果，因此其交互作用並不能形成完全關係，換言之，交互作用變數的效果是否成立還有待商榷，或期待未來的研究能夠再度驗證。

二、相對剝奪感假說的檢驗

下文的表 4 為驗證相對剝奪感假說的多元迴歸模型。同表 3 之形式，此次迴歸分析仍有六個模型，第一個模型將討論功績主義與相對剝奪感兩者單獨對於主觀社會地位的影響；第二個模型為加入控制變數後，觀察功績主義與相對剝奪感兩者各自對於主觀社會地位的淨影響力；第三個模型為再加入社交網絡規模與客觀階級後，再次釐清功績主義與相對剝奪感各自對於主觀社會地位的影響力；最後，第四、第五及第六個模型為加入本研究預設的交互作用變數，即社交網絡規模和相對剝奪感，以及客觀階級和相對剝奪感之交互作用變數，並找出這兩者在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中調節效果是否存在。

表 4 主觀社會地位影響因素之 OLS 迴歸分析 (N=1899)

| 變數名稱 (對照組) | Model1 | Model2 | Model3 | Model4 | Model5 | Model6 |
|----------------|-----------------------|-----------------------|-------------------------------|-------------------------------|-------------------------------|-------------------------------|
| 功績主義 | -0.047 (-1.497) | 0.050 (1.618) | 0.052 ⁺ (1.710) | 0.052 ⁺ (1.690) | 0.059 ⁺ (1.912) | 0.058 ⁺ (1.890) |
| 相對剝奪感 | -0.305*** (-9.410) | -0.173*** (-5.408) | -0.168*** (-5.245) | -0.206*** (-4.426) | -0.356** (-2.677) | -0.409** (-2.861) |
| 社交網絡規模 | | | 0.002 (1.538) | 0.002 (1.107) | 0.002 (1.633) | 0.002 (1.170) |
| 客觀階級 (資本階級) | | | | | | |
| 自營作業者 | | | -0.738*** (-3.569) | -0.734*** (-3.548) | -0.684** (-3.064) | -0.682** (-3.056) |
| 新中產階級 | | | -0.386* (-2.076) | -0.380* (-2.045) | -0.460* (-2.390) | -0.459* (-2.384) |
| 非技術工人 | | | -0.665*** (-3.628) | -0.661*** (-3.604) | -0.776*** (-4.035) | -0.774*** (-4.023) |
| 非勞動力 | | | -0.571** (-3.066) | -0.568** (-3.050) | -0.627** (-3.231) | -0.637** (-3.280) |
| 社交網絡規模*功績主義 | | | | 0.001 (1.055) | | 0.001 (1.012) |
| 自營作業者*功績主義 | | | | | 0.005 (0.030) | 0.016 (0.095) |
| 新中產階級*功績主義 | | | | | 0.231 (1.582) | 0.237 (1.624) |
| 非技術工人*功績主義 | | | | | 0.257 ⁺ (1.779) | 0.266 ⁺ (1.838) |
| 非勞動力*功績主義 | | | | | 0.168 (1.168) | 0.199 (1.351) |
| 性別 (女性) | | | | | | |
| 男性 | | -0.082 (-1.094) | -0.109 (-1.459) | -0.113 (-1.500) | -0.108 (-1.433) | -0.110 (-1.462) |
| 族群 (閩南人) | | | | | | |
| 客家人 | | -0.122 (-1.055) | -0.107 (-0.932) | -0.104 (-0.903) | -0.108 (-0.937) | -0.104 (-0.906) |
| 原住民 | | 0.439 (1.517) | 0.478 ⁺ (1.657) | 0.472 (1.636) | 0.492 ⁺ (1.705) | 0.488 ⁺ (1.693) |
| 外省人 | | 0.077 (0.615) | 0.100 (0.797) | 0.092 (0.735) | 0.086 (0.683) | 0.081 (0.641) |
| 教育年數 | | 0.136*** (11.420) | 0.124*** (10.129) | 0.124*** (10.121) | 0.122*** (9.907) | 0.122*** (9.914) |
| 年齡 | | 0.014*** (4.983) | 0.013*** (4.427) | 0.013*** (4.422) | 0.013*** (4.291) | 0.013*** (4.271) |
| 經濟困難度 | | -0.345*** (-9.636) | -0.318*** (-8.803) | -0.317*** (-8.767) | -0.319*** (-8.818) | -0.319*** (-8.812) |
| 常數 | 4.767*** (107.559) | 3.398*** (11.934) | 3.979*** (11.621) | 3.995*** (11.658) | 4.089*** (11.795) | 4.114*** (11.837) |
| R ² | 0.045 | 0.179 | 0.190 | 0.190 | 0.193 | 0.193 |

註：P<0.1⁺；P<0.05*；P<0.01**；P<0.001***，雙尾檢定，括弧內為 t 值

首先將觀察功績主義和相對剝奪感兩者對於主觀社會地位的影響在各個模型中的變化。從模型一中可以發現在單獨討論兩者對於主觀社會地位的影響時，功績主義的影響並不顯著，反之，相對剝奪感則是呈現出十分顯著的負向影響；在模型二控制了背景因素後，功績主義的影響仍未顯著，而相對剝奪感在係數和顯著性上雖有降低，但其影響仍然是相當顯著的，可知就算在控制了客觀的個人背景因素後，相對剝奪感對於主觀社會地位的影響力仍然是獨立存在的。而同樣地，模型一和模型二之間的 R^2 差異（兩者之間 R^2 差了 0.135）也顯示了在主觀社會地位的變化上，客觀環境的影響可能還是遠大於功績主義和相對剝奪感的；在模型三中再加入社交網絡規模與客觀階級後，相對剝奪感對於主觀社會地位的負向影響仍是十分顯著的，本研究的相對剝奪假說也獲得證實是可能存在的，相對剝奪感對於主觀社會地位的負向影響是獨立於客觀階級與社交網絡規模等客觀因素而存在，並且在此模型中控制了其他變數的情形下，相對剝奪感每提高 1 分，主觀社會地位的階層就下降 0.168 層；另一方面，功績主義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關係的迴歸係數同樣也達到本研究預設的顯著水準且其關係為正向，也就是說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情形下，當對個人於功績主義的認同每提高 1 分時，其主觀社會地位也會提高 0.052 層，此結果也表現出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可能存在的。而上述兩種關係並不會隨著後面模型多加入交互作用變數而使其顯著性有所變化。

再來將探討社交網絡規模和客觀階級兩者的交互作用變數，在相對剝奪感和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中是否存在調節作用。在社交網絡規模方面，可以發現到在模型四至模型六之間，不論是其本身或是交互作用變數，對於主觀社會地位的影響都是不顯著的，也就是說社交網絡規模在相對剝奪感和主觀社會地位之間關係上並未存在調節作用；在客觀階級方面，可以發現到相較於資本階級而言，僅有非技術工人的交互作用變數在相對剝奪感和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上有存在顯著的調節作用，但其方向性與相對剝奪感的係數相反，換言之，相較於資本階級而言，相對剝奪感對於主觀社會地位的負向影響對於非技術工人而言是較

小的。此結果與本研究原先的假設並不相同，本研究原先預設弱勢階級者在面對更嚴峻的經濟困境下，其主觀社會地位會因為其感受到的相對剝奪感較為深刻而使自身的主觀社會地位更為低下，但於分析結果中卻是相反的趨勢。本研究猜測可能是一方面非技術工人的工作不穩定且高替代性，使他們珍惜每一次的勞動與收入，進而使其較能任勞任怨，所以相對剝奪感的影響相較於資本階級而言是較差的；另一方面，有鑑於非技術工人本身的工作薪資普遍而言較低，使其較為容易認知到自己本來就追趕不上有錢人，但生活又並非過不下去，再加上自己與其他人相比雖不有錢，但也不認為自己低人一等，因此在主觀社會地位的回答趨勢上反而是較為樂觀的，所以主觀社會地位反而和相對剝奪感呈現相反的趨勢。然而，上述的論述僅為本研究的推論，過去研究並未發現到此現象，也有可能此結果為本次資料上的樣本特性，還有待未來研究重複驗證並找出更具有理論脈絡或系統性的理由。

第五節 小結

整合上文所得之結果與過去研究的經驗後，顯示不僅過去研究所發現到的各種變化趨勢仍然持續，且在分析上也驗證了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確實存在一些關聯性，而這些發現也與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相呼應，這些問題包括：第一，功績主義的認同和相對剝奪感是否有所關聯；第二，主觀社會地位的變化與相對剝奪感之間是否有所關聯；第三，功績主義的認同是否與主觀社會地位的變化有所關聯？

首先，功績主義認同與相對剝奪感兩者於臺灣社會中長時間的變遷，以及各階級間的差異皆與過去研究所發現的趨勢相同，而這些現象仍然持續。功績主義的認同方面，從 1985 年至 2015 年來的 30 年間，臺灣民眾對於「吃苦就一定能成功」這一功績主義信念贊成者的比例隨著時間演進而越來越少，且不贊成者越來越多，顯示臺灣民眾對於功績主義的認同正逐漸弱化，這與過去研究所發現的趨勢一致，臺灣民眾因為工作機會的與經濟環境的變遷，使其在功績主義和工作

價值的認同上逐漸趨於保守，且也因為社會不平等的惡化使得社會整體逐漸對此信念感到懷疑（林宗弘 2013；蔡明璋 2012）；對於「追趕不上有錢人」此論述的贊成者則於這 20 年來有著小幅的成長，以及不贊同者比例的降低，也顯示出臺灣民眾的相對剝奪感仍隨著時間而增強。另外，從各階級間功績主義認同、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的差異中，可以發現如過去研究所言，新中產階級不僅在現今臺灣社會中是社經地位較為優勢者（林宗弘 2013；林宗弘 2015），也是在自我認同上呈現出較有自信的一群，他們有顯著較高的社會地位認知、較低的功績主義認同與相對剝奪感，與經濟上較為弱勢的自營作業者和非技術工人有完全相反的趨勢。

對照過去的研究所發現到的趨勢，造成上述這些現象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在於經濟環境變遷，以及階級固化等社會不平等逐漸被大眾所認知。例如薪資凍漲與文憑貶值等現象使付出與收穫之間不再相符；同時，資本家與新中產階級則透過繼承資本、投資與人脈擴大優勢並造成更進一步的貧富不均，導致臺灣民眾對功績主義的認同有著持續弱化的趨勢（林宗弘 2013；林宗弘 2015）。另外，過去研究認為並非只有客觀結構會影響功績主義的認同，資訊流通的程度、都市化程度、世代與族群等其他因素導致不同群體內部資訊管道的封閉性差異，亦是造成功績主義認同差異的主要原因（林宗弘 2013），而本研究認為從這一論述中可以延伸出來的解釋是：「吃苦就一定會成功」這一功績主義的論述在臺灣的傳統觀念中是相當普遍的認知，對於那些身處於農村者、教育程度較低者、年輕世代者以及原住民等資訊流通較為封閉的群體而言，在本來就較為相信臺灣傳統觀念的基礎上，又更缺乏與外在世界交流資訊的管道與能力，因此更促成階級與都市化程度等因素強化了功績主義認同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再者，臺灣社會整體的相對剝奪感逐漸增強的理由與功績主義認同弱化的原因相同，與臺灣社會的不平等逐漸擴大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資本家與新中產階級因社會結構的轉型與貿易國際化的契機得以獲得更多的利益，但這些利益並未回饋到臺灣內部的經濟體系裡面，造成更進一步的財富不均（林宗弘 2015）。

而在分析的過程中，發現對於臺灣民眾而言，在控制了客觀階級位置、社交網絡規模兩者，以及年齡、教育程度、經濟困難度等客觀因素後，功績主義的認同確實會顯著影響相對剝奪感的感受，並且越是認同功績主義的人其相對剝奪感就會越低，顯示個人對於公平、合理的價值觀認同確實會影響其相對剝奪感受。此結果不僅驗證了功績主義假說可能成立外，亦確實回答了本研究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功績主義確實和相對剝奪感的變化有所關聯，也與過去針對其他國家的研究所發現的現象相同（Runciman 1993；Crosby 1976；Ellemers and Bos 1998；Smith et al. 2012）。

在另一次的迴歸分析中，也發現到對於臺灣民眾而言，在控制了本研究預設的各種個人背景因素後，相對剝奪感確實會顯著影響主觀社會地位，並且相對剝奪感越是深刻者，其主觀社會地位就會越低，此結果證實相對剝奪感假說是可能存在的，亦回答了本研究第二個問題，也就是主觀社會地位的變化確實和相對剝奪感有所關聯；而在同一組迴歸模型中，功績主義與主觀社會地位的關聯也一併被證實是可能存在的，並且功績主義認同越高者，其主觀社會地位就會越高，此結果也確實回答了本研究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功績主義的認同確實與主觀社會地位認知的變化有所關聯。這些結果亦顯示出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以及功績主義和主觀社會地位的關係對於不同國家的人而言似乎都是有跡可循的（Csepele et al. 2004；Pettigrew et al. 2008）。

最後，客觀階級與社交網絡規模的交互作用在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中並未有太多顯著的調節作用，唯獨身為弱勢階級的非技術工人在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上有較為顯著的差異，並且相對於資本階級而言，兩者之間的負相關是會被減弱的。其結果在過去的研究中並未有過詳細的討論，本文推測非技術工人是較為「認命」的，他們自知追趕不上有錢人，但又不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是較低的，所以才會有此一統計上的結果出現。但這僅是本研究的發現與推測，此結果也有可能是本研究所採用的樣本特性所致，也期待未來研究能夠重複驗證並找出其規律所在。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近幾年來臺灣貧富差距擴大、薪資凍漲等社會問題不斷浮出檯面，使得臺灣民眾的意識形態認同逐漸轉變。而臺灣的學者觀察到此一社會氛圍的變化，並試圖對此現象提出了諸多可能的解釋，這些解釋包括因社會的快速變遷所導致的無所適從、就業環境的變化導致工作價值觀趨於保守，或是經濟衰退與社會結構僵化所導致的失落感等。在整合過去相關的研究結果後，本研究發現在這些研究中提到的三個於臺灣民眾價值觀與認同轉變中重要的因素：「吃苦就一定會成功」的功績主義傾向、自認為「追趕不上的有錢人」的相對剝奪感，以及主觀社會地位。上述三者顯然與臺灣民眾近幾年來的失落感受有所關聯，且其之間的關係更可能是環環相扣的。但在過去並未有研究有系統地討論這三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是故本研究嘗試探討三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並提出三個的核心問題：：第一，功績主義的認同和相對剝奪感是否有所關聯？第二，主觀社會地位的變化與相對剝奪感之間是否有所關聯？第三，功績主義的認同是否與主觀社會地位的變化有所關聯？本研究透過回答這三個問題，以達到更進一步瞭解臺灣民眾近幾年來的內在感受變化模式之目的。

本研究在驗證假設與回答提問的過程中，不僅得以梳理出臺灣民眾於功績主義認同、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三者認知的的基本樣貌，並知曉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從功績主義認同、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的長期演變和各階級身份之間的差異中，本研究發現如同過去研究所言，臺灣社會結構轉變所帶來的不適應，以及階級結構的不平等正是導致功績主義認同的弱化與相對剝奪感受增強的主要原因，並且這一趨勢可能仍然持續著；在功績主義假說的驗證過程中，本研究發現功績主義的認同確實能有效減緩相對剝奪感的感受，但在社交網絡規模與客觀階級的交互作用上則無有效的調節功能；在相對剝奪感假說的驗證過程中，本研究發現相對剝奪感對於社會地位的影響是存在的，且相對剝奪感越高則會使主觀社會地位的階層越低，但此一效果對於非技術工人而言似乎較為輕微。

最後，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也提供了功績主義與主觀社會地位之間可能存在正相關的證據。

而本研究的結果也補足了前人研究的不足。過去研究確實捕捉到了臺灣民眾近幾年來的意識形態變化並探討其背後結構性的原因為何（林宗弘 2013；蔡明璋 2012；關秉寅、王永慈 2005）。然而，其討論僅止於其成因，後續這些主觀認同、意識與感受之間是否還有所關聯則沒有被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因此本研究嘗試連結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三者的關係，試圖釐清它們之間是否存在一個合理的關聯性，並對此關係做一個嘗試性的分析與簡短討論，以提供未來在與臺灣民眾主觀意識形態有關的討論中有更多的可能性得以發揮。

總而言之，本研究發現了臺灣民眾在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三者的認同上確實可能存在相互影響的關聯性，且此一關聯並非是透過客觀的階級身份或個人的社交網絡規模所形成的，換言之，三者之間的關聯可能是獨立存在的。儘管意識形態、自我認同等個人內在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難以界定，但並不能否認的是個人對於自身的身份認同與感受並非僅決定於客觀的外在事物，個人主觀的價值觀、意識形態與感受本身同樣皆具有其重要性，且很可能是相互影響的。而本研究從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和主觀社會地位三者之間的關係中，觀察到了過去研究並未詳細談及的意識形態、心理感受與自我身份認同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希望藉由本研究的討論能為未來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研究方向，也就是提供除了探討客觀因素所導致的心理認同與認知的變化外，個人的意識形態認同與感受亦是應著重討論的重要因素。

然而，本研究的結果仍有許多不足和缺憾之處，有待未來研究的補充與驗證。首先，資料庫的限制使本研究在許多概念的測量上可能有所偏差，例如僅能以個人的社交網絡規模來測量個人所能從參考團體得知的訊息多寡，但並未能表現出個人所能接觸之參考團體或個人之間的差異性，導致幾乎在所有的分析中並未發現其顯著效果；抑或是僅能使用單一概念測量功績主義與相對剝奪感，但過去研究皆顯示兩者的概念是難以測量且內容相當龐雜（Crosby 1976；Yitzhaki 1979；

Runciman 1993 ; Bell 1995 ; Ellemers and Bos 1998)，希望未來的研究者能以更合適的資料庫與精準的變數定義來進行後續的驗證與研究；再者，也期待未來研究能採用更合適或先進的分析模型，甚至是嘗試以質性研究的方式，找出並確立臺灣民眾心中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與主觀社會地位三者之間存在的因果關係，使這三者的關係能以更系統性的理論架構來解釋。

最後，本研究從意識型態認同與心理感受等個人心理狀態的角度出發，探討其對於個人身份認同的影響，並嘗試尋找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本研究可能並不算是一個具有完整論述體系或重大研究成果的研究論文，但希望能藉由本研究這樣一個嘗試性的發想，能夠啟發未來對於這類主觀心理變化的討論，並期待未來學者能夠延續相關主題的研究，以豐富功績主義、相對剝奪感以及主觀社會地位三個概念的各種可能論述。

參考文獻

- 杜慧、卢旖旎、李丁，2013，〈基于HLM模型的员工相对剥夺感影响因子实证研究〉。《科学与管理》(3)：41-46。
- 吳乃德，1994，〈階級認知與階級認同：比較瑞典、美國、臺灣，和兩個階級架構〉。頁109-148，收錄於許嘉猷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林宗弘，2009，〈臺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臺灣社會學刊》(43)：93-158。
- 林宗弘，2013，〈失落的年代：臺灣民眾階級認知與意識形態的變遷〉。《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5(4)：689-734。
- 林宗弘，2015，〈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5(2)：45-68。
- 林晏如，2015，〈相對剝奪感與健康—負面健康行為中介效果之驗證〉。《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4(4)：286-301。
- 林晏如，2016，〈所得相對剝奪感與健康關聯性分析〉。《應用經濟論叢》(99)：137-176。
- 黃毅志，1999，《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臺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黃毅志，2003，〈「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與教育社會學研究本土化〉。《教育研究集刊》49(4)：1-31。
- 張峰彬、關秉寅，2012，〈高教擴張、失業與主觀社會地位變遷〉。頁186-215，收錄於於謝雨生、傅仰止編，《臺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社會階層與勞動市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3》。臺北：中研院社研所。

傅仰止、章英華、張晉芬、杜素豪、廖培珊，2015，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15 第七期第一次：綜合問卷組（C00315_1）。【原始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doi:10.6141/TW-SRDA-C00315_1-1

蔡明璋，1996，《臺灣的貧窮：下層階級的結構分析》。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蔡明璋，2012，〈工作價值、成功條件與公平：臺灣民眾的長期分析〉。頁 186-215，收錄於謝雨生、傅仰止編，《臺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社會階層與勞動市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 3》。臺北：中研院社研所。

謝雨生、黃美玲，2012，〈家庭社會階級對子女教育進階的影響及變遷〉。頁 94-142，收錄於謝雨生、傅仰止編，《臺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社會階層與勞動市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 3》。臺北：中研院社研所。

蕭新煌，1994，〈新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臺灣、美國與瑞典的初步比較〉。頁 73-108，收錄於許嘉猷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蘇國賢，2008，〈臺灣的所得分配與社會流動之長期趨勢〉。頁 187-216，收錄於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臺灣社會》。臺北：群學出版社。

駱明慶，2002，〈誰是臺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113-147。

關秉寅、王永慈，2005，〈寧靜革命：臺灣社會價值觀的變化〉。頁 65-99，收錄於王振寰、章英華編，《凝聚臺灣生命力》。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Bell, Daniel 著、高銜、王宏周、魏章玲譯，1995，《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臺北：桂冠圖書。（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Andersen, Robert, Josh Curtis, 2012, "The Polarizing Effect of Economic Inequality on Class Identification: Evidence from 44 Countries."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30(1): 129-141.
- Csepeli, György, Antal Örkény, Mária Székelyi and Ildikó Barna, 2004, "Blindness to Success: Social Psychological Objectives Along the Way to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pp. 213-240 in *Creating social trust i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edited by Kornai, Janos, Bo Rothstein and Susan Rose-Ackerm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Ellemers, Naomi and Arjan E.R. Bos, 1998, "Social Identity,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oping with the Threat of Position Loss: A Field Study Among Native Shopkeepers in Amsterdam."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8(21): 1987-2006.
- Evans, M.D.R., Jonathan Kelley and Tamas Kolosi Tarki, 1992, "Images of Class: Public Perceptions in Hungary and Austral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461-482.
- Evans, M.D.R. and Jonathan Kelley, 2004, "Subjective Social Location: Data from 21 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6(1): 3-38.
- Faye, J. Crosby, 1976, "A Model of Egoistical Relative Depr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83(2): 85-113.
- Fu, Yang-Chih, 2005, "Measuring Personal Networks with Daily Contacts: A Single-item Survey Question and the Contact Diary." *Social Networks*, 27: 169-186.
- Hey, John D. and Peter J. Lambert, 1980,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Com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5(3): 567-573.
- Kelley, Jonathan and M. D. R. Evans, 1995,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Six Western N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2): 157-178.

- Lucas, Samuel R., 2001,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1642-1690.
- Liu, Jeng, and Arthur Sakamoto, 2005, "Relative Deprivation, Efficiency Wag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n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3: 305-341.
- Merton, Robert K., Paul F. Lazarsfeld, 1950, *Continuities in Social Research: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merican Soldier"*. New York: Free Press.
- Marx, Karl, 2010, *Wage-Labour and Capital*. Whitefish, Montana: Kessinger Pub.
- McCoy, Shannon K., Joseph D. Wellman, Brandon Cosley, Laura Saslow and Elissa Epel, 2013, "Is the Belief in Meritocracy Palliative for Members of Low Status Groups? Evidence for a Benefit for Self-Esteem and Physical Health via Perceived Control."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4): 307-318.
- Oddsson, G. A., 2010, "Class Awareness in Ice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30: 292-312.
- Pettigrew, Thomas F., Oliver Christ, Ulrich Wagner, Roel W. Meertens, Rolf van Dick and Andreas Zick, 2008,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group Prejud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4(2): 385-401.
- Runciman, W. G., 1993,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ldershot: Ashgate Pub. Co.
- Reftery, Adrian E. and Michael Hout., 1993,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75."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6: 41-62.
- Roxane de la Sablonnière and Francine Tougas, 2008,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imes of Dramatic Social Change: The Case of Nurs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8(9): 2293-2314.

- Smith, Heather J., Thomas F. Pettigrew, Gina M. Pippin and Silvana Bialosiewicz, 2012, "Relative Deprivation: A Theoretical and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3): 203-232.
- Smith, Heather J. and Yuen J. Huo, 2014, "Relative Deprivation: How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Inequality Influence Social Behavior and Health." *Policy Insight from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1): 231-238.
- Wiederkehr, Virginie, Virginie Bonnot, Silvia Krauth-Gruber and Céline Darnon, 2015, "Belief in School Meritocracy as a System-justifying Tool for Low Status Stude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1053.
- Yitzhaki, Shlomo, 197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3(2): 321-324.